联合国 S/PV.8451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四五一次会议

2019年1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科尔托雷亚尔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比利时	雷恩代尔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法国..	盖冈夫人
	德国	马斯先生
	印度尼西亚	马尔苏迪夫人
	科威特	谢赫·萨巴赫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庫提卡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哈迈德勋爵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应对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2019年1月2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1)

19-02009 (C)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应对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2019年1月2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1)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伯利兹、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斐济、芬兰、希腊、危地马拉、海地、匈牙利、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马尔代夫、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葡萄牙、卡塔尔、菲律宾、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索马里、斯洛伐克、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图瓦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先生、世界气象组织首席科学家帕维尔•卡巴特先生以及史汀生中心环境安全方案研究助理林赛•格彻尔女士。

施泰纳先生在瑞士达沃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安东尼奥•帕伦蒂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阁下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罗伯特•马尔迪尼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观察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1，其中载有2019年1月2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迪卡洛女士发言。

迪卡洛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及时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

气候引发的灾害造成各种风险并不是某个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的情景。对于全球各地的数百万人来说，这些风险已成为一个现实，而且不会自行消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去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热浪将有增无减，暴雨将下得越来越猛，海平面将继续升高，农业将受到更严重的破坏。这些趋势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安全风险。然而，在本已脆弱的区域，人们对这些趋势造成的后果感受最为深切。在这些区域，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加剧了现有的不满和威胁。

气候造成的风险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复杂，往往与政治、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海平面上升显然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主要后果，最终危及沿海社区和小岛屿国家的生存。极端天气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另一个主要后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飓风“艾尔玛”、“哈维”和“玛利亚”使美洲和加勒比大西洋沿岸大约300万人流离失所。该区域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例如，在海地，自2010年发生毁灭性地震以来，一系列与气候相关的灾害袭击了该国，导致不稳定和长期的人道主义危机。

气候变化也间接但同样严重地影响和平与安全。例如，在萨赫勒和苏丹，气候变化加剧了对日益减少的土地、饲料和水资源的争夺，加剧了牧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乍得湖流域，气候变化导致降雨变得难以预测，阻碍传统的谋生选项，加剧了社会经济排斥现象，降低了加入武装团体的机会成本。

气候造成的流离失所现象也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索马里，频繁发生长时间的干旱是造成26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此种流离失所又加剧了当地紧张局势以及武装团体贩运人口、剥削和招募儿童的情况。

对安全理事会来说，这不是新闻。最近几个月，安理会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等因素给马里、索马里、西非和萨赫勒、中部非洲以及苏丹等地的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就秘书长而言，他阐述了广泛的预防愿景，并把提高我们应对可能加剧危机和导致暴力冲突的更广泛压力和冲击的能力作为优先事项。整个联合国系统正在加紧努力利用能力，加强应对措施。例如，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一直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密切合作，分析该区域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并共同制定区域预防战略。中亚也在采用这些区域办法，在联合国预防外交区域中心的支持下，中亚各国正在进行协商，通过区域合作促进在跨界水资源管理领域取得进展。我们的特派团还根据具体国情，针对气候变化的后果作出应对。在索马里，联合国正在努力制定一个有效的抗旱方案。

展望未来，联合国将着力开展一些行动。

首先，我们正在加强分析能力。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内外的执行人员合作，正在制定一个综合风险评估框架，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此外，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11/15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的背景信息，作为回应，联合国正在努力确保在规定的报告中更好地反映这种分析。

第二，联合国正在寻求加强证据基础，以支持制定实地一级的气候风险预防和管理战略。我们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感兴趣的行为体共同审查将为这项工作提供参考的良好做法。

第三，我们正在加强与会员国、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日益壮大的研究界的伙伴关系，以利用在该问题上的现有能力。处理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是一个集体问题，需要集体应对。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要言出行随。大国军队和大企业早就认识到需要为气候相关风险做好准备，它们正确地将气候变化视为威胁倍增因素。我们不能落后。我们现在就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并承诺将人民，特别是最边缘化和最脆弱的人，置于我们努力的中心。鉴于安全理事会的关键作用和责任，今天的辩论会让我感到鼓舞。这表明，我们愿意就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达成共识。在这方面，我要再次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召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迪卡洛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施泰纳先生发言。

施泰纳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对由于技术问题无法建立视频连接表示歉意。因此，我的发言将限于简要概述我想与安全理事会分享的要点，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交完整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主席先生你以贵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在本次辩论会中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我还要与我的同事罗斯玛丽•迪卡洛和我们的其他通报者一起表示希望，我们今天与安理会分享的内容不仅将表明安理会正在探索的相关问题，而且将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世界现在需要抱着紧迫感处理该问题。

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冲突和不安全，这些因素的每一项都威胁到人类安全和发展。今天就有这方面的例子。但是，这些因素的汇总可能会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本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其中指出，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以及未能实施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全球风险，严重性远高于网络安全、数据失窃和威胁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的其他此类现象。

安理会成员都知道，气候变化是一个风险倍增因素。它加剧了本已脆弱的局势，包括冲突国家的局势，那里的社区应对额外冲击的能力有限。我们在世界银行的同事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如果不采取紧急气候行动，2050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将有1.4亿多人在本国境内迁徙，大大增加城市弱势社区已经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开展实地工作时，见证了气候变化如何导致不安全并且越来越多地加剧冲突。例如，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西非牧民和定居人口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受害人数超过了与政治事态发展相关的一些极端暴力事件造成的受害人数。这些都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表明我们没有及时应对挑战。请允许我非常简略地阐述已经出现的三大主题。

首先，我的同事罗斯玛丽·迪卡洛刚刚提到的科学变得越来越清晰，无论是在影响的性质和规模方面，还是在气候变化与其不仅在大气层、而且实际上在生物圈的影响两者间的联系方面。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等，这些事件显然威胁到全球社区，也许尤其首当其冲的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人和沿海社区。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威胁的经验证据越来越清楚。所有国家在巴黎商定的国家自主贡献不仅是行动计划，也是风险图，说明各国确定在哪些领域优先采取措施，应对其安全、经济福祉和发展前景遭受的威胁。伊拉克的情况令人关注。伊拉克提交给《巴黎协定》的行动计划侧重于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包括将气候风险、生态系统恢复和太阳能解决方案纳入新解放区复原的主流。

我要指出的第二个要点是，我们应对这些威胁及其对人类安全的挑战的能力，需要一个与降低气候灾害风险、建设和平及许多发展措施有关的有效综合议程，包括调整我们的经济并因此减少排放。正确的方法是，整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防备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努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实际利用各种措施促成重大改变的方法。其中包括相应优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森林管理提供了成本效益高的强有力手段，可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生计风险，特别是为农村经济提供管理这一问题的机会。

我想在此提出的第三点是，在我们处理前两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人们已经面临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更大效果，现在迫切需要对气候适应能力和复原力进行投资。即使我们为1.5度世界遏制排放量，千百万人已经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和风险。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气候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我要列举我们在世界各地工作的两三个例子，说明我们目前正如何努力协助各国处理这一问题。我还要指出，在今天的开发署，我们实际上在140个国家拥有数百个项目组合，协助各国处理气候缓解和适应优先事项。

在马尔代夫，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淡水供应。马尔代夫政府和开发署在三个岛屿试行了创新的综合水管理系统。我高兴地报告，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目前正在提供资金，在45个岛屿扩大这种综合水管理系统，确保综合利用雨水和地下水，造福马尔代夫四分之一的人口。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在加勒比地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开发计划署与该地区四家最大的保险公

司合作，支持各国政府制定措施，促使将财务风险从易受气候影响的家庭转移到私营部门。这一举措将扩大加勒比地区的保险覆盖面，巩固该地区的重建工作。

最后一个例子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该国政府与开发署合作，制定了一个气候冲击脆弱性指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此类指数——来衡量家庭对飓风、风暴和其他气候现象的脆弱性。它不仅被用于社会保护政策系统，还被用作灾害风险规划和灾害响应的工具。鉴于今天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让我们齐聚一堂讨论这个关键问题，这个例子非常应景。

在简短发言的最后，我呼吁所有与会者考虑当今世界是如何看待气候风险的、以及世界如何评估气候对未来构成的威胁，包括对我们各国经济未来和人类与国家安全未来的威胁。归根结底，气候也对我们展望未来的方式构成了跨界挑战。

我感谢有此机会以电话方式向安理会发言，并再次对未能亲自与会表示歉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施泰纳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卡巴特先生发言。

卡巴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今天荣幸地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联合国系统在天气、气候和水资源方面的权威声音——的秘书长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气象组织有192个成员国和领土，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正如我的同事阿希姆·施泰纳所指出，本周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发布了其年度《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再次指出，极端天气、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危机是全球风险中的四个首要生存威胁。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与对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其他冲击和影响有着重要的关联。

这项调查再次突出了气象组织核心业务的极端重要性，这项业务的核心是预警:旨在防止自然灾害演变成灾难的预警，以及关于我们不断变化的气候的预警。这些预警是整整40年前在气象组织1979年组织的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上发布的。

全球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浓度平均值在2017年达到了百万分之405，并在2018-2019年间继续上升至创纪录的水平。我们的地球上一次经历类似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在300万到500万年前，当时的气温约比现在高2到3度，海平面比现在高10到20米。气象组织2018年关于气候状况的临时声明显示，过去四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四年，发生了许多带有气候变化特征的影响重大的天气事件。有记录以来最热的20年发生在过去22年中。全球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高出了近1度。

关于极端天气威胁，2017年是有史以来影响最严重、造成代价最大的大西洋飓风季节，损失超过2820亿美元，玛丽亚、艾尔玛和哈维等主要飓风对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造成了严重影响。世界银行估计，飓风玛丽亚给多米尼加岛造成的损失总额达13亿美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4%。在该季节造成的损失中，约有99.7%是该季节的三次主要飓风——哈维、艾尔玛和玛丽亚造成的。另一场著名飓风纳特是哥斯达黎加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该季节也是有记录以来发生多次5级飓风的仅有的六年之一。

2018年8月，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遭遇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导致140多万人流离失所、超过540万人受灾。日本西部大部分地区在6月底和7月初经历了毁灭性的洪水，造成至少230人死亡、数千所房屋被毁。3月和4月，东非许多地区受到洪水影响，包括以前曾遭遇严重干旱的肯尼亚和索马里，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北部与中部。截至2018年9月，在国际移民组织追踪的1770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中，有230万人流离失所是因为与天气和气候事件相关的灾难。在索马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2018年1月至7月间

记录了约64.2万名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造成他们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是洪水，其次是干旱和冲突。

气象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和科学家网络的研究表明，海平面上升和极地冰盖的融化都在加速，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北极海冰面积缩小不仅影响到当地环境和土著人民，也影响到世界人口稠密地区的天气模式。冰川融化仍未得到控制，造成洪水增加等短期影响，并使数百万人长期受到供水威胁。海洋热含量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对海洋生物、珊瑚礁和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气候变化造成了多方面的安全影响:逆转在营养和食物供应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增加野火风险，加剧空气质量挑战；以及增加用水冲突的可能性，导致更多人境内流离失所和移民。因此，气候变化日益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今天，气象组织史上首次作为联合国机构在本会议厅内向安全理事会正式通报气候和极端天气问题。我们希望，这将促进安全理事会成员与包括气象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并建立未来通报情况的机制，从而有可能在理解和分析和平与安全威胁的适当领域为决策提供权威信息并支持安理会开展外交事务。

气象组织正在通过联合国总部的一名专职协调干事加强其对联合国行动和危机中心的支持，以提供专家信息，协助联合国领导层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洪水、干旱和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正在削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这将带来悲惨后果。

气象组织致力于为9月份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峰会提供尖端科学，并支持会员国采取基于证据的气候行动。为了应对挑战和推动国际议程，必须用新的政治和投资范式来提供新一代水文气候预测和预警服务。这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类似于道路和桥梁的基础设施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将之视为必不可少之物，而不仅仅是“有也不错”的东西。

气象组织荣幸地支持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提供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的和平与安全威胁的高质量信息。我们再次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多米尼加共和国卓有远见地组织本次辩论会，并感谢有机会今天上午在本会议厅向安理会发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卡巴特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格彻尔女士发言。

格彻尔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并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召开本次辩论会。

我作为年轻人，在此要求采取行动，因为承担气候变化后果的将是我这代人和我的后代。我们致力于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以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中。

我将阐述安全理事会为减少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可以采取的三个具体步骤。

首先，安全理事会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正式承认气候变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第二，联合国部署的各特派团应评估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当地青年，以及青年可以如何参与复原力和可持续性建设。

第三，联合国部署的各特派团必须在实地向使用清洁能源过渡，这将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并建设更可持续的社区。

安全理事会早应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正式承认气候变化对安全构成的威胁。我赞扬安理会讨论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但同时，自安理会第一次就这一问题举行辩论会以来已有10年，而且没有通过任何决议，申明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一个安全问题。我在位于华盛顿市的国际安全政策研究所史汀生中心工

作，我们正在进行创新研究，探讨社会和经济脆弱性、治理不善、移民现象和渔业衰退会如何影响沿海城市的稳定。我们通过叠加这些因素来确定气候变化导致不稳定风险最大的地方，以便更好地确定政策、投资和援助的目标。

在座各位都清楚，气候变化对安全构成威胁。今天，我们知道仅在2017年就有1800万人因风暴、干旱、洪水和热浪而流离失所。正如我们在过去几个大西洋飓风季节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飓风肆虐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当地政府根本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天气事件，这种天气变得越来越常见。在地方政府无法向人民提供基本服务时，结果就出现流离失所、贫困、政治不稳定和暴力等现象。气候变化还正在损害数百万人的粮食和经济安全。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非洲和中东更极端、更漫长的干旱与当地的冲突有关。随着海洋变暖和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沿海社区，特别是岛屿国家的沿海社区，将失去他们世代依赖的食物和生计来源。

简而言之，气候变化造成人们的处境不安全，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放弃生计，因为他们失去了收入、食物和生活方式。这显然影响了政治和社会稳定。重要的是，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面临人口贩运、失业、贫困等问题，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下一顿饭会从哪里而来。

联合国已经将气候变化纳入了驻索马里、达尔富尔、马里、中非共和国和乍得湖地区等特派团的任务，但是，安全理事会承认气候变化对安全产生影响的决议，还必须要求将对气候的敏感性作为所有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任务的一部分。

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的下一步措施是要确认气候变化对年轻人的过度影响，以及年轻人作为创新者的独特作用，他们可以为解决这一全球问题提出新的想法。安全理事会应要求秘书长派驻每个特派团的特别代表评估气候变化对当地青年的影响，特别是流离失所、失业、粮食安全和武装团体招募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不安全因素会导致冲突持续存在。特别代表应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其调查结果。这种评估将起到预警机制的作用，可以提醒安理会注意到，在哪些地区气候变化将阻碍联合国特派团开展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活动。

已部署的特派团还必须让年轻人参与寻找在其社区建立气候复原力的解决方案。仅举一个例子，在圣卢西亚，当地一名年轻人Johanan Dujon先生看到气候引起的有害海藻大量繁殖破坏了当地的渔业，他利用冲上岸的海藻制造了一种肥料。这提高了当地渔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改善了当地的园艺和农业。自从Dujon先生开始经营这项工作以来的三年里，他已经从圣卢西亚海岸移走了将近300吨海藻。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创新解决方案来应对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联合国及其新推出的《2030年青年战略》可以作为一个平台，让青年人分享他们的想法，并为他们的倡议找到支持。

最后，联合国必须实现本机构的长期目标，减少外地特派团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通过减少已部署特派团的能源足迹，联合国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污染，同时在其服务的社区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可持续能源，联合国可以防止对化石燃料市场的依赖，建立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社区。根据联合国外勤支助部进行的一项环境研究，截至2017年4月，可再生能源在已部署特派团发电量中所占比例不到1%，这意味着特派团几乎完全依赖化石燃料，特别是柴油。安全理事会应通过一项决议，承诺到2025年5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并利用秘书长的定期报告跟踪进展情况。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既直接影响到安全，又是各种威胁的倍增因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现在就采取行动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尽管我对《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多边框架感到鼓舞，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承诺很重要，但我们若要防止气温上升超过1.5摄氏度，这些承诺还远远不够。

青年人必须成为找到和维持这些解决办法的核心。对全世界近20亿年轻人而言，不存在可以选择不关心这个问题的可能。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解决办法。否则，我们、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未来将面临种种后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格彻尔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请科威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言。

谢赫·萨巴赫（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友好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阁下主持本次会议，讨论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还要提醒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我感谢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先生、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首席科学家帕维尔·卡巴特先生和史汀生中心环境安全项目研究助理林赛·格彻尔女士，感谢他们的宝贵简报。

近年来，气候变化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已经举行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讨论解决这一现象的最佳方式。国际社会的这些努力和不懈努力导致2015年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我们必须致力于维护和执行该协定，以免地球进一步恶化。最近的科学研究强调，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保护和维护环境所采取的步骤要快。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洪水、风暴、荒漠化以及气温和海平面上升，未来几年，这将威胁太平洋一些岛屿国家的生存，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正遭受粮食不安全、缺水和其他健康危害，这些危害影响到人和生物。这些事实突出表明，气候变化是一种跨界现象，任何国家都不会幸免于其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我们大家都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是，这将需要国际和区域层面的政治意愿、合作以及团结，才能按照已商定的旨在处理该现象影响的框架，采取具体措施。这包括那些执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措施，以便在可能情况下到2020年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摄氏2度或1.5度以下。

我们对世界气象组织认定，2015、2016和2017年全球气温升高创下记录。我们希望秘书长呼吁9月份召开的气候问题首脑会议将取得进展，调集所需的国际支持，补充去年年底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取得的成果。在那次会议上达成重要协议，以提高各种计划与方案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旨在减少排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国家的资金支助，从而帮助他们调适，努力减少自然灾害，继续落实将于2020年生效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巴黎协定》的各项相关原则。

联合国的估计表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正在增多，占过去二十年中所发生自然灾害的70%。国际社会面临处理这些灾害所致紧急状况的巨大挑战。这些灾害导致每年300万人死亡，许多人受伤和受灾，过去二十年中，该数字达到14亿。

气候变化是非洲大陆、特别是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各种挑战与困难的根源之一。它为因稀有资源而起的冲突与竞夺推波助澜，由此加剧社会经济困难，影响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国际上关注气候变化的同时，科威特国同样也在关切。现实情况是，我们与其它国家一样，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我的国家科威特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处理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在地方、区域以及国际各级不遗余力，特别是从开始谈判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巴黎协定》以来，而我们已批准该《协定》。科威特国尤其关注可再生能源和通过使用风能和太阳能进行能源多样化。到2020

年，这将帮助满足我国能源需求的15%。石油部门也制订战略，管理温室气体排放，以期减排，提高环境友好型能源的效率。

科威特还倡导国际合作与集体努力，将它作为政府和公众集体应对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原方面紧急状况的一部分。我们还向面临自然灾害和正在摆脱冲突国家的民众伸出援手。这既包括紧急救济，也包括发展和重建方案。我们担负起处理和减轻自然灾害方面危机的国际责任。事实上，气候变化影响粮食保障、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空气以及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更多步骤和技术措施，采纳新的行为方式，更加雄心勃勃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3。

最后，我们强调，我们将继续支持各种联合国机关在危机和灾害管理、建设和平以及处理气候变化及其对安全影响方面所做的努力，因为该现象具有多层面性。这需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的广泛讨论，因为我们相信：要根据国家的优先事项与能力，本着共同承担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领域的责任但有所区别的原则，来处理该现象，从而实现我们各族人民的愿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外交大臣发言。

雷德尔斯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召开今天的会议。比利时欢迎安全理事在处理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方面发挥作用。我还感谢会议开始时的各位发言者为今天的辩论会作好铺垫。

今天，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如何增加各种不同地区如萨赫勒、中东、中亚、加勒比以及太平洋岛屿国家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大量证据。如飓风、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强度更高，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社会政治紧张。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了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后果，为此，再不应该对该问题是否与安全理事会有关抱有任何怀疑。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紧急找到雄心勃勃的共同对策。作为政策制订者，我们责任重大。我们必须听取后代的呼声。

我愿谈以下三个问题：预防性做法的重要性，安理会如何更好地顾及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联，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对策。

首先，要有效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任务，安理会就必须关注预警迹象，提高对那些可导致冲突的情况、包括气候情况的敏感认识。预防冲突不止是一计良策，在许多方面还是一项利润丰厚的战略。具体而言，它使我们有可能对积极和前瞻性的行为进行投入，而非事后通过成本更高而成效较低的维和行动进行干预。

其次，关于安理会如何处理该问题，早就应该在其定期工作中思考气候方面的风险。比利时高度重视把气候风险纳入国家或区域的讨论，包括有关延长维和任期的讨论。我欣见最近一些决议已经顾及这个因素。我想到的特别是萨赫勒，那里爆发牧民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缺水。还有阿富汗，那里的干旱导致破坏稳定的移民流动。显然，安理会要想充分担负责任，提高其预防冲突的能力，顾及气候风险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

第三，在比利时看来，是时候在联合国系统内围绕这一问题进一步组织起来了，汇集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部门的专门知识，以便交叉参考和运用现有知识。如果建立一个体制性协调中心，或者说一个信息交流机制，就能满足酌情为安理会提供有关国家和区域的适当风险分析和管理战略。可以在秘书处内或通过诸如附属机构等也让会员国参与的形式这样做。

年度专题通报将是一个好的出发点。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有关区域和平行动的详细分析和定期报告也将有助益。比利时欣见，在一些情况下，这一点已在实施。但是，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这不是一个无谓增加该体制性机制的负担的问题，而是根据联合国独特的综合方针设法将现有专门知识汇聚在一起的问题。

在秘书长9月份召开气候变化问题峰会前，2019年将再次成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如果我们的行动缺乏雄心壮志，那么气候变化的后果将更具灾难性。我们必须作出更多努力，以缓解灾难性气候变化，并充分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但是，我们还必须适应正在变暖的世界。 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第二十四次缔约方会议的成果是建设适应能力、增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减少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的重要步骤。安理会也必须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更加关注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并使整个联合国系统更密切地参与其中。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辩论至关重要。我坚信，这一辩论将会在这里及其它地方继续下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发言。

马尔苏迪夫人（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赞扬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颇有见地的介绍。

气候变化是真实的，目前正在发生。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平静的海滨城市三宝垄。它位于一个低洼三角洲。自十七世纪该城市建立以来，其沿海地区在雨季期间一直易受我们称为“抢劫式洪水”的海水洪灾侵害。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脆弱性。抢劫式洪水发生频率有所增加。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所作的研究，今后100年，在我的家乡三宝垄，气候变化将造成海平面上升40至80厘米，从而使内陆可能被淹没面积扩大1.7至3平方公里。我的家乡清楚显示，气候变化构成的安全威胁无可争辩。然而，作为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的城市，三宝垄具有适应能力。

但是，对于全球许多其它地方来说，情况肯定不是这样。如果没有适应能力，潜在的安全威胁就会变成真实的安全威胁——从失去生计到非正常移民，从粮食匮乏到失去土地，而且也许就连国家的生存都会岌岌可危。因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我们各国的生存感到关切，印度尼西亚对此感同身受。那么问题就是，安全理事会应如何应对这一威胁？请允许我强调几个要点。

第一，安全理事会必须加强努力，以更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我再说一遍，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而不是气候变化本身。在过去的讨论中，安全理事会已认识到在萨赫勒和非洲之角气候变化给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能够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就是使我们的维和人员具备更好的能力开展除战争之外的军事行动——不仅开展维和行动，而且还开展气候和平任务。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维和人员随时准备介绍其除战争以外军事行动方面的经验。

第二，我们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办法必须——我再说一遍，必须——确保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协同增效。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谋求和平的努力必须考虑到往往被忽略的可持续发展方面。

第三，我谨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影响的责任在于有关各国。我们必须做的不是干涉，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和优先事项提供援助。印度尼西亚随时准备作出贡献。我们向太平洋区域和非洲提供了技术援助，以提升这些区域的适应能力。我们致力于做得更多。

不应忽视区域组织的作用，因为造成的影响往往波及邻国。在本区域，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加强了其人道主义援助中心的能力，以便提供协调一致的对策，即一个东盟，一个对策。

最后，安理会的任务就是更好地界定什么属于气候变化本身范畴，什么构成气候有关影响的安全层面。联合国系统必须根据其各机构的各自权限和任务齐心协力开展工作。

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虽然安全理事会能够处理气候变化的安全层面，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论坛。捍卫《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绝对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可以

放心，印度尼西亚随时准备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作出贡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发言。

马斯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冲突是安全理事会日常事务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并非经常有机会后退一步，考虑这些冲突的原因。因此，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邀请我们今天这样做。

我谨告诉安理会成员，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只是后退一步，而是大约57万步。去年有六个月时间，德国宇航员Alexander Gerst在位于高空的国际空间站俯视我们的地球。他发回地球的图像震惊了欧洲许多人。自记录开始以来最干旱的夏季清楚地留下了痕迹。甚至从太空都能看到这一痕迹。在一年中的那个时候通常为绿色大陆的地方，其时却像一片棕黄色的草原。我随身带来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一干旱的后果是，作物损失多达数十亿；甚至在北欧也发生了灾难性的森林大火；在德国某些地区，燃料开始变得稀缺，因为河水位太低，油轮无法航行。

我知道，同世界其它地方与气候有关的极端天气造成的灾难相比，这一切听起来都无关紧要。在萨赫勒，由于缺少水和耕地，冲突日益增多。随着乍得湖面积不断缩小，所有居民的生计正在消失，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绝好的滋生地。在伊拉克，缺水正在损害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在阿富汗和也门，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我们仍然记得曾肆虐加利福尼亚的森林大会。海平面上升和飓风正危及许多岛屿国家的生存，主席先生，其中包括贵国所在区域的岛屿国家。

气候变化切实存在。它正在造成全球性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构成威胁。正因如此，安全理事会是举行辩论会讨论气候变化对政策的影响的适当场所。在处理所有冲突局势时，我们都应考虑到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这必须成为惯例。我们应专注于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需要获得可靠和全面的信息。正因如此，秘书长系统地报告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十分重要。

第二，安全理事会需要可靠的风险分析和预测以及明确的行动建议。我们的瑞典朋友为此目的加强了联合国系统的能力，我们希望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第三，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在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授权范围内，尤其是在联合国在实地的工作中，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必须加强联合国分析实地局势的能力。我们的伙伴，特别是区域组织，需要建立预警能力，我们必须通过实施速效项目，支持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关注这三个方面是德国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主要优先事项。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此并非只有我们优先重视这三个方面。去年，我们与瑙鲁和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成立了“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该小组得到了广泛的国际专家网络的支持。我们将一道就如何改进我们的应对工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我们希望在6月4日于柏林举行的气候与安全问题高级别会议上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请允许我邀请在座各位与我们一切参加这次会议。

在弗里乔夫·南森探险极地125年后，一次新的北极之行将于9月启动。德国研究船RV Polarstern将在一年内——其中大约150天为极夜——穿越极地冰冻的海洋。来自比利时、中国、法国、波兰、俄罗斯、美国和联合王国等17个国家的约600名男女科学家将登上研究船。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提醒人类注意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后果。气候变化切实存在。它正在造成全球性影响，正因如此，不仅科学家应聚集在一起，共乘一舟，我们这些安全理事会成员也应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北极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预警系统。安全理事会必须成为国际政策的预警系统。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Kurtyka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邀请我今天在此就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谈谈波兰的看法。主席先生，我也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人——即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阿希姆·施泰纳先生、帕维尔·卡巴特先生和林赛·格彻尔女士——对我们的讨论所做的贡献。

今天的讨论聚焦自然灾害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生存威胁，促使我们这些安理会成员从预防和安全的角度审视这一威胁，以便以有效和创新性方式加以应对。我不只是以波兰环境部国务秘书的身份在安理会发言。今年，我还荣幸地在卡托维兹主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我谨感谢各位通报人提及卡托维兹，将它誉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将谈三点。第一，我要在安理会谈谈为何我们认为讨论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是恰当的；第二，使用哪些工具才能以适当的方式处理此种相应的联系；第三，简要地谈谈最近通过的被称为《卡托维兹规则手册》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

第一，也就是“为什么是恰当的”这个问题，世界各地的气候都在发生变化。我确信，我没有必要说服在座的每一个人相信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通常，与气候有关的事件地方性很强，但是，这样的地方性事件会产生蝴蝶效应。此类事件影响人们的生计、安全以及供给、生产和运作的能力，从而为引燃潜在的冲突提供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理由。气候引发的冲突会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有时相当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样的例子近在眼前，我们不必四处寻找，人们一再提到的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区域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处理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接下来我要谈谈工具。你们可能会问:安全理事会对此能做些什么？我请安理会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还要作出预测，进行预防。如我的比利时和德国同事刚才提到的那样，所有可能受到此类威胁影响的国家都应该拥有一个准确的预警信息收集系统，这个系统将提醒我们注意可能由气候引发的突发事件和冲突。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旨在加强面临风险国家复原力的活动，可以成功实现这一目标。所有国家和组织都应充分利用其在实地的办事处和特派团的潜力，收集并分享此类信息。第二，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应通过定期讨论和辩论在安全理事会中占据突出地位，成为一项预防工具，重点是解决办法和监测。应该定期通报安全理事会，在应对和减轻气候变化的全球安全影响方面，存在哪些威胁和进展。

第三，我要谈谈全球应对措施，并提请各位代表关注12月在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取得的成就。我再次感谢科威特代表和提到这一重要事件的许多其他发言人。我有幸主持了被称为缔约方大会第24届会议的全球气候会议。

气候变化的有形影响可能只限于地方，但不可或缺的解决办法显然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问题根源的唯一方法必须通过一致的全球努力得到落实。在漫长的谈判后，我们通过了一项被称为“卡托维兹守则”的文件，它使《巴黎协定》发挥作用。它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它明确了世界各国必须如何、何时、按照何种方式采取行动。第二，它让世界转变方向，走上一条通往具体、单一的透明度体系的道路。第三，它针对需要气候融资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向其提供融资和其他支助的非常具体的框架。

波兰第四次担任全球气候进程的主席，为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我们对各国正在竭力解决的种种问题和我们眼前这一问题的规模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理解。气候威胁要求我们必须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今天，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席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波兰谨再次强调，气候变化是一股破坏我们世界稳定的力量，理应让安全理事会关注并采取行动，从而实现我们地球的持久和可持续和平。

艾哈迈德勋爵（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同其他人一道感谢你安排今天这次辩论会，让安全理事会有机会进一步审议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身的经验鼓励你成为这一问题的有力倡导者和该领域的领导者。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所有人这样说：我们期待你稍后在辩论会中的发言。我也要感谢所有通报人，但我对林赛·格彻尔女士的贡献尤为感动。通过注意到气候变化的挑战和顾及青年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应承认，我们不仅应该让青年参与进来，还应该让他们参与寻找解决办法。从我国政府的视角来看——我相信我的发言可以代表会议厅内外的许多人——我当然要作出这一承诺，因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而青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这对联合王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2007年就成为首个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该问题的国家（见S/PV.5663）。我们尤其关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包括我们英联邦近60%的成员国，它们面临着气候变化和相关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威胁。

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提到了2017年飓风厄玛的严重破坏。在飓风厄玛之后，我也访问了加勒比，当地遭受的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当地人民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国首相梅夫人说过，发达经济体显然有道德责任来帮助那些可能由于人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而受到最大损失的国家。通过我们的国际气候基金，我们支持更清洁的经济增长，并已帮助2100多万人为旱涝灾害增加的风险做好准备。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我们承诺向基金提供至少70亿美元的支持，我们的目标是平衡我们在适应和减灾方面的支出。我们还努力加强我们在加勒比区域的工作，通过汇集资源、能力、资产和专业技能，对极端天气事件构成的挑战作出齐心协力的强力回应，从而建设复原力。

我们都认识到，气候变化不是抽象的、理论上的风险。它是真实的，而且正在发生。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曾经百年一遇的恶劣天气事件现在每十年就发生两三次，有时更频繁。它们影响到各种基本资源，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它们威胁可持续发展，包括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开展贸易的能力，并加剧冲突和不稳定。这种局势实际上比之前所想的要严重得多。联合王国独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与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合作开展的研究最近得出结论：我们大大低估了气候变化的社会风险，实际上也低估了经济风险。

这种风险当然威胁到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为解决办法献计献策，包括通过我们正在开展的重要讨论。在2015年的巴黎，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为这个共同问题找到了一个共同解决办法。正如英国首相所言，《巴黎协定》是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我们现在必须加快全球行动，履行我们所作的承诺，我们也必须听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呼吁，加强我们的宏伟目标。这包括通过我们现有的伙伴关系开展工作。例如，在去年4月的伦敦，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重申其致力于《巴黎协定》，并继续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限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我也要赞扬波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发挥的领导作用。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大力赞扬秘书长努力使联合国重新关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需求。我们认为，联合国需要从三个重要方面加强其气候安全方针。

第一，关于信息共享，我们必须更好地利用私营部门、更重要的是民间社会现有的气候风险数据。我们必须将这类数据融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决策。

第二，我们需要在规划和落实和平方案、尤其是解决安全问题时，全盘考虑所有风险，包括与气候有关的风险。正如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提到，安全理事会已经开始在近期各项决议中反映这一点，尤其是——我对他表示赞同——关于乍得湖、索马里、萨赫勒、马里和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当前任务是确保其有效执行，重要的是，要将其纳入我们的发展、建设和平和人道主义工作。联合王国欢迎试行一个小型机制，以确保联合国报告可以获得信息，但它应探索如何更进一步，例如改善在实地管理气候安全风险的联合国机构和特派团的协调与整合。

最后，我们必须投资于复原力。在今年秘书长气候峰会召开之前，联合王国将带头努力增强复原力，同时与各种行为体协作，以启动我们希望的真正变革性的行动。我谨再次向格彻尔女士说，我确信她的建议已引起我们所有人反思，而从英联邦的角度说，我下周将有机会在伦敦接待来自英联邦的青年大使。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一定会非常深入地反思她的意见和建议。

单从经济角度看，这也是有道理的。投入和应对灾害的准备将使灾后部署人道主义援助的成本平均减少一半——是的，一半。这还会使应对危机行动提前多达两周时间。复原力还为支持就业和扩大繁荣范围提供巨大机会，这当然会加速发展并最终增强安全。通过联合王国主导的全球防灾中心，我们正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提高这些国家防备乃至抵御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总之，与气候有关的安全挑战无疑是真实的；它们就在这里，就在当下。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确保联合国系统能够在决策时全方位考虑气候风险，而且，最重要的是，将这些风险纳入特派团规划，并最终纳入执行工作。

马朝旭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欢迎你来纽约主持本次会议。中方高度赞赏多米尼加倡议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施泰纳署长、卡巴教授和盖特谢尔女士刚才所作的通报。

气候变化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对世界许多地区造成危害，对有关地区粮食安全、水资源、生态环境、能源和人民生命财产等构成严重威胁。在个别地区，上述问题甚至成为破坏和平稳定的因素。

减缓气候灾害的影响很显然有利于全球的稳定。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在这里，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出发，我愿谈三点看法。

第一，要坚持多边主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气候变化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各国应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坚持多边机制，切实履行国际义务。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支持力度，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联合国各相关机构应该根据各自的职能和分工，妥善处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

第二，要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国际社会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面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视解决贫困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最终依靠实现共同发展，来解决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所产生的粮食安全、人道危机和大规模移民潮等等问题。

第三，要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重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切实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坚持公平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发达国家应继续率先减排，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等加强适应和减缓能力、管理能力和融资能力。

中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规定的相关义务，结合自身国情与能力，努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将继续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同国际社会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谨感谢今天会议的所有通报者。

俄罗斯联邦有关气候变化安全影响的立场众所周知。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宗旨是迅速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审议气候变化未免过分，甚至适得其反。我们认为，这一做法会削弱联合国内目前的分工制度。是的，气候在变化。然而，气候变化并非国际安全方面的普遍挑战。因此，应视各种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通报者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确认了这一点。

正如阿希姆·施泰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些情况下，气候变化可能会成为一些国家和区域的额外风险因素。然而，笼统地将气候变化问题同和平挂钩，会导致这样一个错误假设：环境问题不可避免，而且总会导致冲突。此外，如果我们以概念说明（S/2019/1，附件）中提到的萨赫勒地区为例，那么我们就不应将重点转移到气候和干旱上而忽视冲突的真正主因，其中包括一些国家导致利比亚政权更迭的主动行为和北约的空袭、包括空袭该国石油和油田基础设施的可怕影响。今天，在另一个区域，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外部挑衅如何以具体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加剧国内危机，以及违反国际法，这正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回到气候问题上来，我谨指出，无人否认，必须采取全面办法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 充分发展这种做法的每一次机会都是由联合国现有专门机构提供的。这些机构为此开展了具体的专家级工作，而非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俄罗斯联邦一贯主张扩大国际合作，以减少灾害风险，加强抗灾能力。我们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我们认为，为了确保效力，我们必须凭借精深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进行专业对话，至为重要的是，这是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减灾会议通过并经大会第69/283号决议核可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非洲行动纲领》是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的主要机制，目的是加强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国际合作的全球架构。

必须挖掘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潜力，促进区域层面的合作。由于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关于利用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决定，亚太区域在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内率先受益于减少灾害风险领域高科技方面的实际发展，人们非常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这种发展。

我们敦促安理会侧重于提供技术援助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这些国家最容易遭受社会经济领域多方面挑战造成的自然灾害。俄罗斯联邦向南太平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促进应对灾害的可持续能力。我们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其他专门方案、 基金和机构以及国际民防组织这样做。

目前正在开展技术援助项目，以加强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工作，并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及中东各国自然灾害的后果。所有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都必须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的总体潜力。

至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相关挑战是，确保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框架内全面遵守执行12月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核准的综合文件的规则。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在全球和国家层面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有助于防止气温上升，降低自然灾害频次和破坏力日渐增大的风险，减轻其对最脆弱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不利的社会经济影响。另外还必须考虑到气候风险，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要结合对安理会议程上具体和实际情势的讨论予以考虑-如果它们确实存在。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感谢主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本次至关重要的公开辩论会，讨论气候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国代表团赞扬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和其他通报者的精彩发言。

我国赞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穆罕默德女士将要作的发言。

气候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问题在世界当前的安全关切中占据突出地位。我国注意到，自然灾害频仍，而且越来越严重，对受影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除其它外，这一事态发展与世界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这两种现象有关联。1990年代初，全世界每年发生的灾害不到300起，但2000年代初以来，专家每年记录的灾害超过500起。此外，他们估计，到2025年，预计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洪灾和/或风暴的风险。

适如自然灾害增多的部分原因是气候现象恶化，自然灾害造成的物质和人员损失与城市扩张和人口集中在危险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有关。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00年有70万人生活在易发洪灾的沿海地区；根据最悲观的预测，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00万，2060年将高达2500万。

在人口飙升的环境中，加之可耕地和水资源稀缺，自然灾害可能引发或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从而可能恶化为公开冲突。同样，在预警和卫生应对机制无法控制灾害规模的情况下，这些灾害可能会传播水媒或病媒传染的疾病。

非洲现在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区域之一。科特迪瓦的情形就是一个绝佳例证。在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178个国家中，我国排名第147位，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正在遭受此类灾害的负面影响。这些灾害对森林、农业和粮食保障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还引发族群冲突，特别是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冲突。

作为回应，我国通过了一项国家气候变化方案，除其它外，该方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8 %，并将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提高16%。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我国设立了国家平民保护办公室，协助迅速向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我国代表团强调，联合国和国际伙伴必须努力加强国家遏制气候变化和管理自然灾害的能力。

科特迪瓦认为，不能单单根据国家战略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为了收到成效，这些战略必须符合现有的全大陆和国际框架。因此，我国赞同5月2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174次会议关于气候变化与非洲冲突之间的关联和所涉安全问题的相关建议。其中包括制定一个大陆框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成的实际和潜在安全威胁；积极寻求全面的办法，增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改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工作，有效确保从地方到大陆层面的备灾和减少风险工作；最后，加速履行关于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一切现有国际和区域承诺，包括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对于科特迪瓦而言，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仍须是我们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共同承诺的必不可少部分。因此，我国敦促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共同努力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我们再次欢迎帕伦蒂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到场参加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这样一个切合实际的热门主题。我们也感谢今天上午的通报者——阿希姆·施泰纳先生、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帕维尔·卡巴特先生和林赛·格彻尔女士——所作的宝贵发言。

本次辩论会使我们得以讨论安全理事会采取广泛的多层面安保做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和权限。在此情况下，必须解决与气候有关的人类安全风险，科学证据表明，这种风险将因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而加剧。这些风险有可能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冲突和灾害，其范围之广，有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些后果肯定超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任务范围，因此可能需要安全理事会在其与预防和解决冲突有关的职责范围内作出反应。

我们欣见安全理事会在最近几个月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冲突局势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非洲，其中包括乍得湖地区、索马里、西非和萨赫勒、马里和达尔富尔。同样，我们记得，安理会已经能够及时对自然灾害作出反应，例如对2010年海地地震作出反应，增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人员，以处理这一紧急情况。

我们还强调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因海平面上升问题涉及国际法而将其列入议程。我们强调，该问题尤为重要，因为它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严重后果和法律影响，主席先生，比如贵国就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朝着正确方向采取这些步骤将促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基于对风险及其处理战略的适当评估，按照秘书长倡导的改革以及日益重视预防冲突和促进持久和平的做法采取具体对策。我们认为，应当履行这些职能，同时铭记本系统不同机构的任务和职权范围。正因如此，必须发挥安理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以及与联合国系统主管机构的协同作用，以建立气候相关风险和其他多层面威胁的预警系统。

秘鲁极易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安第斯山脉热带冰川消融以及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干旱和水灾导致粮食不安全，破坏发展议程，同时对维持和平提出挑战。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还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有可能产生不稳定局势、新的需求和挑战。

我们最后强调，必须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一道，围绕总体性、一致性的高效战略，包括围绕落实《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解决这些问题。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赞扬主席国多米尼加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贵国处在对付气候变化的最前沿，你恰当地将这个问题列为你的主席任期内一个优先事项。我还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精彩发言。格彻尔女士所说的动员青年人一事，是一束重要的希望之光，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希望。

这次公开辩论会的参与度表明，只要有必要，各会员国就会广泛认识到，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更透彻地了解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很大。气候灾害对人道主义各方面、粮食和健康安全的影响，以及总体上对人类社会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平衡的影响可能加剧国内危机，国内危机反过来可能导致区域和国际危机或加剧现有冲突。

风险无国界。因此我们集体分担危机管理责任。《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将全球变暖限定在2摄氏度之内，如有可能，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并呼吁我们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抗御力，特别是在最脆弱国家，并使资金流动与限制全球气温上升并行不悖。《巴黎协定》现在有了实施细则，我赞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四次会议主席国波兰发挥的作用。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实现我们的目标。定于9月23日召开的气候峰会恰逢其时，将为实现我们的宏伟抱负创造条件。法国将为此扮演重要角色，因为

法国与牙买加一道，受托承担气候融资和供资方面的工作任务。我相信，这次峰会将向安理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安理会必须处理气候变化的影响给我们的共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预料、预防和限制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愿分享法国的三个坚定信念。

第一，气候变化的影响给国际安全带来的风险必须成为预防冲突议程的一项核心内容。我们必须结合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那些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崩溃有关的因素，开展预防外交。第二，需要对这些风险进行严格的定期分析，这符合国际公共利益。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必须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第三个信念是，这种风险分析必须与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发展伙伴和联合国各机构实施的预防措施并举。基于这些信念，法国愿同各会员国一道努力，就法国提出的几项建议开展工作，包括两项主要建议。

第一项建议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工具，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集体分析和预警。数据和分析工具已经具备，但是它们分散在各智库、各国甚至分散在联合国内部不同机构内。我们必须将它们集中到一个核心场所，并让它们有发言权。所缺少的是一个监护者——一个能够就气候和安全之间的联系建立共识的科学信息保障者。法国乐见秘书长扮演这一角色，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世界各地和不同时段的气候变化影响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风险。

还必须全面落实2011年7月安理会经德国提议而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1/15中提出的要求，即秘书长就安理会议程上的冲突提交的报告应当包含有关气候变化对这些冲突的影响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能预测并对某些区域已经存在的和平与安全威胁采取适当对策，例如在萨赫勒或一些岛屿国家，还有南部非洲、中美洲或东南亚，这些威胁可能并非迫在眉睫，但是到一定时候会对安全产生同样的灾难性影响。在国家一级，法国已经启动一些研究方案，特别是为地中海和太平洋地区最脆弱区域制订一种危机分类法。这项工作有可能充实秘书长的报告。

法国的第二项建议涉及联合国在为预防危机而制订具体行动建议方面扮演的角色。面对这些安全威胁，我们必须调动多种工具，从紧急援助到发展政策，不一而足。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极端天气事件之后，将亟需采取人道主义措施。在其他情况下，必须帮助社区适应无可避免的海平面上升、干旱和土壤退化。有时，必须为小农提供保险机制，使其能够在气候灾害之后迅速重启经济活动，而不是被迫迁往其他地区。联合国可以而且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制定这些建议，协调需要实施的努力。

在国家一级，捐助国如法国必须调整其发展政策。在这方面，法国已协同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减灾基金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启动若干项目，包括　“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倡议”，旨在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预警系统的能力，以应对极端气候事件。1亿欧元中的近4000万欧元现已拨付，因此得以为5个国家项目和加勒比、西非和太平洋地区三个区域性多国项目以及一项加勒比地区灾后研究提供资金。

面对这些确定无疑的风险，我们不能躲避，执意否认或听信错误信息。我们可以预见和应对这些风险，预防冲突。这正是联合国的作用，安理会的作用。法国致力于与在座所有国家一起不懈努力，争取在未来数月实现这一目标。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集本次重要会议，欢迎多国部长参加今天会议。我也谨感谢施泰纳署长、迪卡洛副秘书长、Kabat先生和格彻尔女士的贡献，帮助为今天的讨论提供框架。

近年来，许多国家遭受毁灭性自然灾害，包括飓风、洪水和干旱，仅过去十年全球就有20亿人口受到这种灾害的影响。这些灾害造成生命损失，财产损坏和民众流离失所，加剧粮食不安全和疾病爆发的风险。

过去一年，美国发生了我的家乡即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野火及袭击美国大陆的记录在案的最严重飓风之一。我们看到马里兰州山洪泛滥，美国西岸泥石流肆虐。在波多黎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估计，飓风玛丽亚是该岛近代遭受的破坏性最大的飓风。这场灾难性飓风造成人员损失和逾900亿美元的破坏。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灾害可加剧原有的脆弱性，威胁民众赖以可靠提供灾后食品、水和住处的关键基础设施，致使各方包括救援人员、警察和国家军队进入偏远地区，解决团队供给和提供必要服务变得更加困难。自然灾害也经常导致社会秩序崩溃和犯罪、暴力激增与不稳定加剧。

久而久之，严重自然灾害灾后的恢复不彻底侵蚀和阻碍发展，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和机构的发展。尤其是在有冲突或国内暴力历史的社区，可创造条件，使非法活动得以猖獗。

美国的政策是提供人道主义和救济援助，以帮助各国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

美国东海岸和南方加勒比邻国始终面临破坏性飓风的威胁。几十年来，美国经历和应对过各种地震、飓风、龙卷风、干旱、洪水和其他环境灾害。我们不断学习新的和更好的方法，以减轻灾害影响，保护生命和财产。在可行的情况下，制定火灾区、洪泛区或沿海暴风潮影响区域有效的区划法可大大减少损失，良好的建筑法规也可做到这一点。早期预警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美国已经并将继续与面对极端环境挑战的邻国和朋友分享最佳做法。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自然灾害后续影响的破坏严重。飓风影响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灾后恢复需求。近期的干旱加剧了粮食和水不安全的状况，也是造成该地区新的移民流动的因素。针对海地的飓风马修，美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灾后恢复需求，包括为180多万人口提供关键治理、卫生、住房和粮食援助，以及提供现金，用以恢复被破坏的农场和生计。为应对中美洲的干旱，美国正与其它伙伴合作，支持新农业技术，改善小农的商业环境，以此为手段提高生产力、收入和复原力。

除加勒比和中美洲之外，美国正在与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合作，为最需要地区提供救济和备灾能力。这样做是正确的，也有助于维护秩序，维持对突然需要援助的民众提供的基本服务，减少自然灾害发生后出现不稳定的威胁。各国均须尽力，但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国可以而且应该在这项共同努力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协助各国备灾和应对灾害。

正如其他发言者所述，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联合国机构加强信息共享，找出灾后恢复的最佳做法。我们各自侧重于该挑战的一小部分，但数据汇总则可提高我们整体的认识。

正如林赛·格彻尔和其他发言者所示，我们也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探讨联合国特别政治特派团如何更加侧重于灾后复原能力。美国将评估如何最佳地把这项工作纳入相关授权，我们鼓励在座的朋友们也这样做。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发言与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将要作的发言是一致的。

许多高级别发言者参加这次辩论，充分证明所议项目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阁下及该国代表团召集本次辩论，讨论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一令人堪忧的问题。

同样，我们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阿希姆 •施泰纳先生、帕维尔·卡巴特先生和林赛·格彻尔女士参加会议并提供出色通报，为安理会讨论该问题提供所有必要信息。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一种具有全球层面的现象，其影响对人类生存直接构成明

显的威胁，为此，它是我们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包括经济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内的诸多领域的交叉问题。正如我们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其本身不是直接原因，但它对环境的影响使其交叉性构成的威胁倍增。

通过该报告可以推断，在最脆弱地区，如岛屿国家、冲突国家或没有足够资源应对该问题的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和突出。因此，我们认为，解决这一现象的措施之一是推行旨在促进发展、消除贫穷的政策;建立环境问题方面的援助与全球合作制度，以确保有效、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与可持续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挂钩，同时优先帮助最脆弱及资源较少的地区;以及制定可在国家和全球实施的气候变化应对战略。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在尽早而且有效地制定和执行这些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除其他外，提供必要的技术、法律和政治援助，以防止、遏止或解决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危机。我们对安理会关于冲突扩大的看法感兴趣，这要求安理会在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方面发挥作用，并成为有关措施的推动者。

非洲可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大陆，而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对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尽管非洲是产生温室气体最少的区域之一，但仍继续加强努力，努力执行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将这些措施转化为以国家进程为基础、符合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长期气候行动。

在国家一级，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毫不怀疑明确显示全球气温惊人上升的数据的可靠性，全球气温的上升将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包括在获取饮用水、农业生产力降低、生计丧失和移民等方面。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减轻气候变化威胁的措施，并将这些措施纳入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的政策和规划进程。它还正在执行减少风险战略和适应措施，并加强技术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非洲大陆坚定地致力于同气候变化作斗争，这一威胁总体上影响到整个地球，需要所有人毫无例外地早日采取联合、多边行动，采取一系列全球商定的、透明、有效的措施，保证子孙后代的未来。

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没有必要的工具和资源，任何国家都无法对付这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务必强调这方面的合作与团结。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特别是在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否则气候变化的对策将不会有效。

最后，我要指出，世界已经拥有应对这一威胁的必要工具。现在需要的是坚定的政治决心，开始这场斗争，解决这一现象。

马特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荣幸地看到你主持今天的公开辩论。我们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安排这次重要会议，讨论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我们还对今天许多部长来到安理会会议厅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许多通报者向安理会提供的情况。我们注意到格彻尔女士在本次辩论中就青年的作用所作的发言，温布尔登的艾哈迈德勋爵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赞同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将代表非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 南非完全赞同秘书长在2018年12月于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第2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发表的意见，他在会上指出，
>
> “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影响到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立一个安全、有保障、繁荣的世界的所有计划。”

秘书长已发出警告，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不多了。这一警告基于国际科学界的明确发现，还有日益频繁、与极端气候有关的灾害的新现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关于温升1.5°C的影响的特别报告证实，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及其生计的影响，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

我们极为关切地注意到，自然灾害反复无常，十分凶猛，袭击了加勒比和许多岛屿，包括太平洋岛屿，例如飓风；在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一再发生海啸；在澳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野火肆虐；在欧洲，洪水和大雪；在非洲，发生干旱，等等。这些自然灾害给人类造成了数不清的痛苦，摧毁了数百万人的生计，并使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

非洲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对非洲发展和繁荣的最大威胁。我们南非最近几年经历了毁灭性的天气事件，几个地区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因此，非洲全力声援同样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其他区域，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编写的概念说明(S/2019/1，附件)中强调的那些区域。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应对气候变化，应对自然灾害。

我们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要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一个基于规则的多边制度采取集体行动，这一制度要以科学、公平为基础，在国情差异极大的国家之间，在行动和支持方面要有区别。气候行动需要大幅度扩大，同时要保护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消除贫穷。

我们已经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形式为这一多边解决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得到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等区域发展方案的进一步加强。我们将以《气候公约》、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作为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指导和领导，并参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在那些气候变化被认为是造成不安全的重要因素的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安全局势中，如萨赫勒和索马里，安理会必须强调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务必处理的一个因素。通过在此种讨论中发声，安全理事会将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希望这将有助于动员全球行动，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手段和支持。安理会还可帮助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减轻风险战略，处理导致不安全的所有因素。然而，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其它基于证据的研究所表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往往难以确定。在特定情况下，它们可能是冲突的更直接和更具体根源的一个恶化因素，或加剧威胁的因素。非洲已认识到这一现实，在非洲，《非洲联盟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实际步骤总体路线图》确定了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议程构成严重威胁的若干关键领域，自然包括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所构成威胁的真正性质是客观存在和全球性。因此，我们必须作出多边反应，让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各国发出一个声音，并让所有其它利益攸关方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正如秘书长经常指出的那样，解决办法在于全球经济的转型。这“需要包容性，因为每个人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有限以及具体的和平与安全重点意味着它不可能是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适当论坛。因此，我们应谨慎地避免重复联合国系统内其它更有能力处理这一问题的机构的努力。然而，我们仍然愿意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荣幸地主持今天关于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及其对发展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公开辩论会。我要感谢参加今天辩论会的所有与会者对这一专题的极大兴趣。我也要热烈欢迎并赞扬我的同事——各国外交部长——今天来到这里。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者——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阿希姆·施泰纳先生、帕维尔·卡巴特先生和林赛·格彻尔女士今天分别所作的发言。

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安全之间的关联，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近年来，加勒比地区极端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有所增加，这在我国和我们区域引起了震惊。如果不能及时认识并处理这一脆弱性，将对我们各国以及其它受影响区域的国家产生严重后果。

首先，我要强调，我们重视环境与安全之间的关联。在我们看来，重视这一问题与我们同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道努力建立一个应对环境退化所带来多重挑战的体制架构是一致的。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在从环境退化对发展影响的角度审议这一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就《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执行准则达成的协议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十多年来，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联问题在安全理事会不时得到讨论。瑞典在2018年组织的辩论会（见S/PV.8307）、我们今天主持的辩论会、以及德国和比利时等其它成员在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所宣布的各项计划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新兴趣，这并非巧合。在这种关注的同时，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退化及其负面影响所构成的紧迫挑战。

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全球挑战，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以应对其所有方面的问题。关于环境与安全之间的关联，安全理事会已经确立了先例，确认环境变化和退化是几个冲突易发地区的危险因素，而且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不稳定。针对乍得湖和萨赫勒地区的具体情况，安理会明确表示，气候变化的某些影响与加剧局势的其它因素有关。

现有的各种证据表明，今后几年，在全球层面将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全球变暖将给健康、人的生命、粮食安全、供水和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这一趋势意味着必须防止这种消极影响变成冲突的根源。因而，我们认为，必须注意环境退化与安全之间的关联，并在负责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框架内建立处理这种关联问题的机制。

我们必须为安全理事会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系统地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常规风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在脆弱地区。在这方面，为了作出最适当的决定，已经提出了若干设想，我们必须予以注意。现在是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了，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会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遭受极端脆弱性的国家，包括中美洲地峡国家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与安全之间的关联也许更为明显。

我们各国已经在经历一个新的现实，其中包括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逐渐频发的风险，比如人口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不断出现无法预测的问题。我们感谢施泰纳先生说明自然灾害的巨大影响、以及改进体制安排，以便更好协调我们的预防和应对能力的重要性。多米尼加共和国将一些国家的意见在这里提出来，这些国家因其地理位置以及体制和（或）经济弱点，更易遭受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影响。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感到特别紧迫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就将气候影响问题纳入其有关安全工作的最佳途径达成共识。我们正在面临一种非常规威胁，这就要求安理会进一步反思其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这是实地已经存在的现实，我们不可忽视。我们的工作必须是适应这一现实，并使安理会有关安全的做法与时俱进，目的是增强其分析技能，以便确定并最终预防冲突根源。

在这方面，迪卡洛女士雄辩地解释了审议由于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人口和政治等因素交错在一起而产生的动荡和冲突如何属于安理会工作范畴。卡巴特先生还向我们说明了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对人口稠密地区和特别脆弱地区的影响。

正如其他成员已经说过的那样，重复做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工作是不适当的，这不应是我们的宗旨。相反，我们应探索这些机构如何能够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相互补充。通过为反思与气候变化的关联创造体制空间，我们将增进安理会的知识，为安理会提供必要的机制，以确保其对风险和原因的分析切合实际，从而确保其促进和平的行动取得成效。

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应拥有必要的信息，力求在考虑到异常激烈的自然现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的情况下作出战略决定，以便最终能够发挥这一作用，满足千百万人，主要是青年在更美好的世界里，在可持续、有复原力、和平的环境中生活的愿望。多米尼加共和国提议将在这里讨论的所有建议汇编成一份报告，然后提交给秘书长。

我们敦促成员们支持采取具体步骤，使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将这一新问题纳入我们的工作，以增进我们对今天冲突的理解，并防止未来的冲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发言篇幅较长的代表团散发书面文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

我还要通知所有有关人员，由于我们的发言名单很长，午餐时间我们将持续进行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现在请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发言。

霍韦尔·波朗科女士（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危地马拉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当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如果回顾，这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本组织创始成员第一次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而且正在担任安理会主席，就知道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就气候变化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易受此现象不良影响的问题进行至关重要的对话而创造空间，此举加强了我们区域的领导作用。

我感谢各位通报者，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气候变化的范围及其对移民、冲突和国际安全总体情况等问题的影响的更广泛看法。

实际上，成立本组织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危地马拉认为，联合国应从其会员国的最佳利益出发，在无选择性、不考虑既得利益和尊重会员国主权的情况下作出反应。

过去20年来，危地马拉一直是受温室气体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了解气候变化的严重现实。因此，我们决不可无视自然现象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现象是气候变化引起的，以期作出更为有效和高效的决定来预防这些现象。

还必须考虑到，像我国这样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影响。在那里，民众生活条件恶化，生活贫困和极端贫困者尤其如此，不仅因为缺乏体制资源来建立快速反应系统，以减少损失并适应新条件，而且还因为这些人类活动所引发事件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境况悲惨。

我们遭受了1998年“米奇飓风”、2005年“斯坦飓风”、2010年“阿加莎热带风暴”以及2008年和2009年、2014年和2015年的干旱等事件造成的浩劫。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和我们区域显然容易受到极端气候事件危害，这些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失，并给经济和发展机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因此，我国确定并界定了恢复、养护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有关战略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加强我们的体制机构和国家立法。为此，我们已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法律、政策和行动计划。此外，地区规划同发展规划挂钩，并特别注意农村地区、降低风险和有序城市增长。

同样，我们加强了国家减灾协调员办公室，该办公室是负责在遇到灾害时立即高效进行机构间协调的机构。我们创建了国家气候变化及其环境影响

问题全国圆桌对话会，其工作重点在于扭转环境退化指标。我们还在加大对森林再造和恢复的投入，因为我们33％的土地受到保护，70％的能源组合来自可再生能源，国家农业重在林业。

危地马拉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环境，尽管是排放温室气体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由于基础设施受损、粮食无保障状态加剧、水资源数量与质量下降、疾病传播以及土壤退化，这些状况危及并限制了发展。

气候变化还导致被迫移徙，也就是说，我们各国民众被迫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一情况使这一议题变得更加切合实际。因此，它需要考虑到移徙周期的全面解决办法。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每个世界领导人都有责任保护生态系统，因为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可持续发展，这也涉及为子孙后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大家不仅要支持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重要论坛通过的决定，而且要执行它们的基本协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长发言。

西雅尔多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邀请我们在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并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也希望听取非安理会成员就此问题的发言，因为气候变化无疑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应该得到适当解决。随着越来越难以获取资源，气候变化肯定会引发对资源的争夺。所以，我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项安全挑战，主席在发言中非常简洁地指出了这一点。

正如危地马拉外交部长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缺水、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可耕地生产力下降以及某些地区人口激增，肯定会导致更多的大规模移民流动，甚至导致大陆间的移民流动。根据估计和预测，到2050年，由于环境原因，大约2亿移民将会离开家乡。我们在欧洲已经经历了这种情况。2015年至2017年三年期间，有330万人提交了庇护申请，其中90%来自34个国家。在这34个国家中，未来10年人口将增长26%，这意味着将增加6.4亿人。这预示着将有更多的移民潮。不幸的是，过去几年已经表明，移徙对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在欧洲，过去几年，我们一直面临着与移民相关的安全挑战。因此，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联合国和所有国际组织不应该通过鼓励进一步移徙浪潮的决定或文件，把移徙描绘为一项人权或者仅仅会产生积极影响。

国际社会不应该鼓励新的移民潮，不应该对不愿意接纳这一现象的国家施加压力，而应尽一切可能解决产生移民的根源，无论是政治、安全、经济或是环境原因。因此，我们不同意《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也不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该契约应成为一个蓝图，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并将成为移民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地国。我们不接受这一点，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是否愿意成为后三种国家之一，有权决定自己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允许谁进入自己的国家。因此，边境保护将是确保未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权利得不到尊重，那么这可能成为导致进一步冲突和安全风险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正如主席早些时候所说，我们还将面临环境和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巨大安全风险，今后，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发生冲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菲律宾外交部长发言。

洛钦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人类面临着对地球生命的终极挑战，也面临着对自身生存的倒数第二大挑战——迫在眉睫的生态崩溃前景。这不会是自然过程中的另一个冰河时代，而是一种致命的确定性，它完全是人类活动和不作为所导致的。科学证明了这一点。经验表明了这一点。暴风雨的强度不断在加大，表明这一结局已经在来临。只有傻瓜才会对此提出异议。在我们这样特别脆弱的国家中，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最为严重。海平面已经上升60厘米，是全球平均19厘米的三倍多。

我们有7107个美丽的岛屿。今后我们的岛屿会少很多。

并非所有这些损失都会令人后悔。我们有如此多的岛屿和海洋特征，因而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巡逻。它们成为大规模毒品贩运——人类的祸害并造成国家灭亡——的庇护所，人们从毒品国家绝望地逃离就是证明。如果全球变暖趋势得不到遏制，我们98%的珊瑚礁——丰富的渔场——将在本世纪中叶消亡，并在本世纪末彻底灭绝。当然，我们欢迎领土争端的消失，因为引起这些争端的珊瑚礁会连同建在上面的建筑物一道彻底消失在上升的海水中。每一朵云彩都带有一线光明。台风海燕有力地表明，风暴潮几分钟内就摧毁了沿海社区，抹去了几十年的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留下了持久的痛苦。2018年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显示，在过去20年中，我国每年平均损失1%的国内生产总值。气候变化引发了内外战乱。情况会变得更糟，战乱会更多。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以前所未有的范围降临到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与过去不同，这种黑暗永远不会消失。没有启蒙时代会随之到来。除了荒蛮者之外，人的生命不值得存在，在否认气候变化和拒绝其挑战的国家中，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于发达国家的掠夺导致其贫困的欠发达国家而言，这将是一场自我毁灭性的报复。如果全人类不能以同样的条件拥有这个星球，那么，人类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拥有它。苦难理所当然渴望有人陪伴。这是一种正义。我们必须为气候相关灾害制定更好的风险评估和缓解战略。尽管我们的排放量不到全球排放量的1%，但菲律宾坚定地走上了低碳发展的道路。一些富裕得多的社会因为贪婪和无知而不会这么做，但是菲律宾人不同。只要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正确事情，菲律宾人都会去做，即使没有其他人这么做。我们已经通过、继续在改进并实际执行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计划，但是气候变化不分国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境外行动和不作为的影响。

因此，加强各国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更深入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人道主义援助中心根据“一个东盟，一个应对措施”的方针加强了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致力于《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尤其是致力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我们永远看不到可以放弃后者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具有每个继续坚持这一《协定》的人的同样智慧。

我们今天看到了气候驱动的冲突和绝望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我们未来将会看到更多这种现象。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有些人可以躲在墙后，但是他们以后就无法超越高墙。混乱迟早会攀越任何一堵高墙。富有的强国可能会从最后的灾难中得到短暂的解脱，但它们的生命力将遭到极大的削弱。不过，拥有智慧并关心气候变化的人们不应该乞求那些缺乏智慧、缺乏关爱的人给予合作。最终，我们对共同的命运将感到痛楚却真正的满足。然而，我们可以建议安全理事会将气候变化挑战作为其首要、也是最终的安全关切凿在花岗岩上。当末日终于来临，所有的社会纽带都已切断时，相比之下，过去的所有冲突都会犹如一场体育竞赛，这包括二十一世纪极为可怕的头二十年，它不能以无知作为借口，因为二十世纪的恐怖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马尔代夫外交部长发言。

沙希德先生（马尔代夫）（*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担任安全理事会1月份主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举本次重要的辩论会。我还愿感谢各位知名专家在今天上午的通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见地。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于本月开始履职的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即：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德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南非。

在我离开马尔代夫来此之前，我在马累国际机场碰到一个5岁名叫Aisha的小女孩。她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她，我去纽约，到安全理事会讨论气

候变化问题。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在我离开去登机时，她拥抱了我，并向我挥手道别。

在我前往纽约的长途飞行途中，我忍不住想起这个拥抱我的小女孩、她亮晶晶的目光和纯真快乐的微笑，她毫不知晓她今后可能面对怎样的未来。我扪心自问：我能不能真正为这个小女孩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能不能集体帮助她实现她幼小心灵中的希望与梦想？我们能不能为她实现她所渴望和理应享有的未来—一个安全、有保障和健康的未来？放眼当今世界的现状，我不得不做出否定的回答。

气候变化多年来一直在破坏我们这个微小的岛国。它侵蚀我们的海滩，杀死保护我们岛屿的珊瑚礁，导致海水污染我们的淡水，使我们丧失鱼群。但是，最重要的是，气候变化将让我们失去我们的家园。

2007年4月17日，安全理事会举行其有史以来首次关于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辩论会（见S/PV.5663）时，我曾就在这个会议厅中讲述同样这个问题。那天，我曾提醒安理会：气候变化不只是马尔代夫人生活中的日常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生存威胁。我曾提醒安理会：海平面平均升高2米就足以把整个马尔代夫实际淹没在水下。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消亡。

然而，12年后的今天，我仍在安理会重复同样的信息。我们未来的前景比我们想象中的糟糕得多。我们仍在试图决定由哪个联合国论坛来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哪个层面，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湖泊正在干枯，使千百万民众失去淡水。非季节性的干旱使千百万民众无家可归。饥饿和流离失所正在导致冲突，整个国家正在沉入水下。有什么安全威胁比这个更严重？

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和加紧为此所需的行动与投入的《巴黎协定》令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还希望，卡托维兹规则将有助于坚定我们的集体雄心，兑现我们的许诺，把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或者可能的话1.5摄氏度以下。但是，对马尔代夫人来说，等待和希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大幅扭转当前气候变化的趋势，以确保像Aisha和她的朋友这样的小女孩拥有自己的未来。

我们需要的解决办法是依据公正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各自能力范围之内，通过协商一致和国家主导权加以实现。我们寻求的解决方案应该缩小适应与减轻之间的差距。必须为适应预留大量资金。正如在《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设想的那样，这将使国家得以加强基础设施，以减少气候引发的灾害风险。我们寻求的解决方案还应该旨在增强联合国系统的能力，以识别冲突中潜在的气候方面的风险，并早期采取减轻影响的措施。我们认为，秘书处对安理会的通报应包括专家对气候方面风险的分析，以及这些风险如何驱动冲突。

像马尔代夫这样首当其冲受此影响的国家承受不起等待的后果。我们不能坐等所有人能就实地现状达成一致，即：气候变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不能坐等气候所引发灾害的影响破坏我们各国的经济和我们的生计。我们不能坐等气候变化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身份认同，失去我们的家园。我们需要符合我们已做承诺的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Aisha和千百万像她一样的孩子眼中的光芒将泯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海地外长Bocchit Edmond先生阁下发言。

埃德蒙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海地共和国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先生阁下和我本人，祝愿担任安全理事会2019至2020年期间非常任理事国的南非、德国、比利时、印度尼西亚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取得圆满成功。我还祝贺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本次关于“应对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

响”这一主题的公开辩论会，把大家关注的焦点摆在急需持续处理气候脆弱性的风险上。

海地共和国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承认气候方面的灾害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意义以及落实共同行动计划以反击它们所带来各种威胁的重要性。

本次公开辩论会是及时的，因为2019年将标志着启动重要进程，通过综合跟进在近年来各次重大会议上做出的承诺，来倡导联合国的三个支柱与核心价值观。位于这些进程核心的是努力确保《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得到妥善和普遍落实。关于气候方面风险的辩论会符合最近大会主席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和秘书长宣布的优先事项。

海地共和国将继续为推动所有这些进程做出最大努力，因为按照“不应让任何人掉队”的口号，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改善生活条件、尊重所有人尊严的问题。

气候方面的灾害复发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工作，切实威胁许多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因此所有这些国家愈发关注当前和未来气候问题方面的讨论。我完全赞同伯利兹代表将以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名义所做的发言。

近年来，恶劣的气旋在世界多地、特别是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小岛屿国家给人类带来难言的痛苦和大量物质损失。一般而言，复原和重建需求往往超过大多数受影响国家的国家能力。

我国多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如2016年10月的飓风“马修”，摧毁了几乎所有农村人口的生计，破坏了共和国政府的努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灾害对海地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破坏了我国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加剧了我国的结构脆弱性，给经济复苏工作带来了沉重负担，加剧了累积延误，年复一年地拖延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

今天，共和国政府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下，正在寻求在预防这些风险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为了寻求这一现象的迅速、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共和国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先生阁下就任伊始就发起了若干创新举措，包括“变革大篷车”。不幸的是，这些倡议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财政支持。

海地共和国总统和政府的优先目标是巩固民主体制，加强必要的基础设施，吸引创造就业的投资，并总体上改善所有阶层人口的生活条件。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赞同概念说明中有关海地局势的某些说法，特别是 “2009年以来疟疾病例呈上升趋势，其源头可追溯到海地”(S/2019/1，附件，第6页)这种令人质疑的说法。

我强烈鼓励所有国家与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和专门机构一道开展建设性工作，以更加负责任的方式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海地共和国承诺在这一集体气候行动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重申全力支持为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作的一切努力，全力支持落实根据《巴黎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所作的各项承诺。

最后，在以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方面，有两个因素仍然至关重要：一个是所有国家的政治意愿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另一个是调动充足的财政资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环境和气候部长发言。

麦克纳女士（加拿大）（*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感谢你邀请我参加关于气候变化对我们地球安全的影响的讨论。这是一个紧迫而必要的讨论。我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担任这一重要领导职责。

(*以英语发言*)。

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显然也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安全挑战之一，威胁着世界各地公民的生命和生计。同今天在座的许多人一样，加拿大正在努

力减轻气候变化的风险，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加拿大人来说，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野火、酷热、干旱、海平面上升、加拿大北部融冰和永冻层融化，不仅带来不便，而且威胁到生存，特别是对我们一些最脆弱的群体，包括生活在北极以及农村和偏远社区的土著人民来说，尤为如此。加拿大最高军事指挥官最近说，对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不是军事威胁，而是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威胁。

世界各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感受到威胁其生存的巨大影响。无论问题是非洲部分地区的荒漠化、造成气候难民的弱势人口被迫移民、缺水冲突，抑或是海平面上升和小岛屿国家的热带风暴，气候变化的安全方面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正如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所强调的那样，气候变化应被视为一系列可能导致冲突的因素中的一个问题。正如许多人所强调的那样，世界经济论坛连续三年在其《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气候变化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列为世界最高风险，高于大规模网络攻击或恐怖主义。

重要的是要强调，从和平与安全的角度看待气候变化并不损害《巴黎协定》和世界各国在国内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而是对此予以补充，通过扩大框架，认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出于这些原因，加拿大坚定地认为，气候与安全问题必须在安理会的审议中占有明确的位置。我们确认安理会通过近年来通过的决议发挥的领导作用，这些决议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等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为了确保安全理事会有能力继续发挥这一领导作用，正如青年代表今天上午所建议的那样，加拿大支持设立一名新的秘书长气候与安全问题特别代表，并在联合国系统内为这一专题设立一个中心。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好地了解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并在分析冲突或区域局势时报告气候风险。

复杂的问题需要集体解决。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可能面临着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一起行动。我要借此机会强调，加拿大作为一个寻求在2021年至2022年任期内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将继续倡导在气候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中采取注重成果的解决办法，并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包括我们在加勒比的半球伙伴以及所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斐济总检察长兼经济、公务员制度、通信和气候变化部长发言。

赛义德-海尤姆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今天在这里代表斐济总理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先生发言，他由于国内公务繁忙而不能与会。

我们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安全理事会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使国际社会做好准备，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安全后果。气候变化改变了我们的自然世界。极端天气灾难频仍，如严重的洪水、长期干旱、破纪录的热浪和超级气旋，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自然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事件现在每十年就发生一次。极端天气事件的间距越来越小。斐济在2016年经历了热带气旋“温斯顿”，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荡然无存，我们至今仍在恢复之中，诸如此类的一次极端天气事件也会使我们在实现全球商定目标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化为乌有。在斐济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三届年度会议主席期间，我国总理一再强调斐济和世界各地极端天气模式的严重后果。

海平面持续上升对我们各国经济体和社会是一个加剧威胁的因素。2014年，斐济政府将其第一

个沿海社区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随后又迁移了另外两个社区。可悲的是，我们的迁移进程才刚刚开始。还有43个沿海社区将紧随其后迁移。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些迁移问题，但我要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这种迁移不仅将发生在境内，而且将跨越国界。

我已向安全理事会强调这一点，不是要提出任何道德观点，而是要强调，我们离临界点太近，令人不安。我们仍处于一个可以自愿管理境内和跨国界迁移的阶段，因为斐济为接纳我们的一些邻国提供了支持。然而，它们将很快成为大规模的强制移徙，对我们的社会和国际安排造成严重压力。

气候变化正在导致可耕地的流失和人口的迁移，这将增加并导致荒漠化、粮食不安全和健康无保障、以及我们鱼类资源和海洋资源的枯竭。它将导致冲突。当然，气候变化的影响目前在某些地方比其它地方更为明显，但它将是一个最终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很脆弱。

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威胁，无论是在孟加拉国正在消失的海岸线，还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酷热干燥的土地，还是美国低洼城市不断恶化的洪水。这不仅仅是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所有这些影响将给争夺日益紧张资源的个人、社区和民族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

极端的天气模式使我们的经济体和社会更加脆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当经济和社会脆弱性加剧时，我们的体制机构就会遭受损害——更容易受到极端分子、腐败、国际犯罪集团、以及地缘政治机会主义者的操纵。这会造成我们的边界出现更多的漏洞。

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确认，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将继续构成对国家、区域和全球治理体制机构的根本挑战。我们也呼吁联合国领导并支持国家和区域努力，以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日益严重的安全挑战。

斐济在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方面有着悠久而自豪的传统，这给斐济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培训。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帮助我们发展维持和平技能。我国总理已经批准利用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来发展也许是世界上第一支完全能够以快速、灵活和知识的方式作出反应的部队，除了维持和平之外，也对气候引发的灾难作出反应。我们感谢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方面提供援助。

我感谢有机会介绍斐济的观点。我们期待着继续与安全理事会接触，开始处理气候变化所造成日益严重的区域和国际安全后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尼加拉瓜代表发言。

奥基斯特·凯利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高兴地看到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一个姐妹共和国主导本次辩论会。我们还祝贺比利时、德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气候变化的灾难已经导致了一些国家、甚至一些社会遭受挫折。过去是这样，现在又开始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采取紧迫行动，可以预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4200多年前，由于持续100多年的干旱，铜器时代的各个伟大文明几乎都在同一时间里崩塌。在某些情况下，干旱持续了长达300年，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帝国、在古埃及王国、以及在克里特岛的早期米诺斯文明时期。我在想我们的文明能否在经历一场300年的干旱，哪怕只是100年的干旱后幸存下来。

目前，撒哈拉沙漠正在破坏处于冲突中的牧民和农民的生计，而一场伊斯兰战争在附近肆虐，使萨赫勒地区1560万人受到粮食危机的影响，并造成一场危险的大规模向北移徙。乍得湖干涸了95%，影响了面临气候变化和 “博科哈拉姆”行动双重危机

的四个国家的人口。与此同时，青年党在索马里数以万计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当中开展活动。

至于未来，如果自给农作经济继续崩塌，预计到2050年，仅在萨赫勒地区就会有2000万难民。欧洲如果不知道如何处置100万难民，就应该想想面对2000万难民要怎么办。

中美洲和加勒比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之一。在中部美洲，即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有一个干旱日益严重的干旱地区，居住着360万个自给农作家庭。如果出现与气候有关的崩塌，大约1800万人的经济将使该地区城市的贫民窟膨胀，或向北迁移，沿途翻越、深挖或穿过挡道的墙。

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政治意愿。一个指标是缺乏气候问题上的融资。对于缓解和适应而言，真正的考验将是2019年补充绿色气候基金。关于损失和损害，唯一科学、公平与合乎道德的办法是，让造成这一现象的国家向正在承受其历史和当前责任后果的国家提供赔偿，正如尼加拉瓜总统兼统帅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在2015年以其名义向大会所作发言中建议的那样（见A/70/PV.23）。对于那些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激进的人，我们必须提醒他们，损害赔偿的概念自古以来就是世界所有法律和道德制度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已经过时，因为他们认为生存太昂贵了。如果正在丧失其未来的小岛屿国家得不到补偿，世界就不会有气候问题上的公正。

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政策的基础——是科学还是贪婪？是人类和地球长远的共同利益还是短期的国家经济优势？是保护最弱势群体还是促进生产无休止、无限制和无意义增长的自私经济，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消费和资本积累？

我们距离2030年还有11年，我们要作出一些决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祝贺波兰在卡托维兹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但我们必须执行《巴黎协定》，履行减少排放的承诺，并提供资金，使我们能够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我们的文明和对地球母亲上的生命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的未来取决于1.5° C目标。秘书长将于9月份召开气候峰会，我们将有机会发起一场真正有效的生存运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发言。

霍尔特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紧急变革，以阻止全球气温上升超过1.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8年10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用古特雷斯秘书长自己的话来说，“气候变化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行动速度。”

我要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的领导，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自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挪威派部长出席了加勒比共同体外交部长会议，并出席了在瑙鲁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首脑会议。这些会议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我们正在遭受气候变化的蹂躏。气候方面重要的《博埃宣言》是关于气候变化引发的安全威胁的重要文件。全球变暖的证据在我所处的区域——北极也很明显。北极的变化幅度是全球增长幅度的两倍。这将对地方、区域和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气候变化很少直接导致冲突，但却会使威胁成倍加剧。每年有2600万人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250%。到2030年，超过1亿人可能会因气候变化而陷入极端贫困。

女性遭受的后果往往与男性不同。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注重性别平等。

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现有紧张局势，也为冲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会严重破坏经济稳定，滋生政治极端主义，并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国家，特别

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它也严重破坏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共同努力。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我们认为，应该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牢牢列入安理会议程。挪威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国，也将其作为优先事项。挪威也支持任命联合国气候与安全问题特别代表的倡议。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我认为有三条主要防线。仍须将《巴黎协定》作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今年9月的秘书长气候峰会应该重点关注提高追求水平。第二，帮助脆弱国家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应该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我们必须更加关注这一点。我们的第三道防线应该是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纳入发展和安全政策。

也许气候行动能够无可辩驳地说明多边主义的必要性。你不能单打独斗。单打独斗是全然不可取的。因此，我们热烈欢迎德国和瑙鲁关于设立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联合倡议。

机会生于困境。据估计，与一切照旧的做法相比，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大胆行动可以在2030年前产生26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收益。此外，当前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或者应该说是革命，有可能减少与能源相关的冲突。

接下来10到15年是“一旦错过即失去”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事态刻不容缓。在危机中，总是要与时间赛跑。挪威作为始终如一的伙伴，致力于为我们的共同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代表发言。

Teesalu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真挚地感谢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多米尼加共和国，感谢其就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

爱沙尼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作的发言。

气候变化对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构成的威胁。我们早在1990年就已了解了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沿海低洼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尚未采取具体步骤来改变这些变化的进程。气候相关灾害的累积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对人民生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将在已经脆弱的地区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

海平面缓慢开始上升看似是遥远将来的事，而事实上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今天就已经感受得到。例如，在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使贫困、不稳定、饥饿和暴力成倍加剧。

最近的科学数据显示，气候变化影响的发生速度比之前想象的要快得多。世界领先的气候科学家警告说，只剩下十几年可以将全球变暖维持在1.5° C上限范围内。为了有效应对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加强气候抵御能力、备灾和救灾。这只能通过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协同行动来实现。

我国爱沙尼亚历来没有受到重大气候灾害的正面冲击，但气候模式的变化最近对我国农业和林业部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应对措施，我们正在开发关于如何扑灭森林大火的专门知识，并为本地区的类似项目提供支持。尽管这种合作项目可能只是一个小规模的例子，但它们仍然很好地说明，我们通过增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抵御能力获得的经验可以如何造福合作伙伴，帮助它们增强自身抵御能力。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极其复杂，这进而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采取全面方法和综合战略规划，以确保我们对此类影响做好准备。必须继续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各个部门的国家和区域规划。为了确保掌握并充分执行这些计划，社会上的所有利益集团，特别是妇女和青年，都必须参与这一进程。

此外，必须更加明确气候变化与贫困、粮食、水和能源安全以及移民和冲突之间的联系，以影响

国家政策议程。在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能够而且应该采取更系统的方法，将气候变化因素视为冲突局势的起因和倍增因素。爱沙尼亚完全支持秘书长将预防作为重点。在这一方面，在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派团中考虑并注重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对解决冲突进程的结果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我们爱沙尼亚人在社会创新和数字化方面走在最前列，相信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是一个可以使用现代技术工具的领域，预警系统就是明证。我们的长期战略预见促进减少排放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更多投资于支持低碳、更节能和更适应气候变化的世界的新解决方案。我们的合作努力特别侧重于处境最危险的国家、即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还自豪地成为增强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项目的贡献者和合作者。

在结束发言时，请允许我向安理会保证，爱沙尼亚完全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斗争。如果我们当选为2020-2021年度安全理事会成员，这也将成为爱沙尼亚的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坚信，我们有责任采取有效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其对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影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韦纳威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本次公开辩论会对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自2007年在本会议厅首次讨论这一问题（见S/PV.5663）以来，会员国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不安全的驱动因素、造成冲突的威胁倍增因素以及对我们集体安全的威胁。

虽然有其它联合国机构拥有权限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但安理会必须参与解决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国际和跨国威胁。不承认不断变化的气候，就不能完全消除冲突根源，也不能承担秘书长所强调的预防重任。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已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今天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并鼓励加强与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其它机构的协调。我们还希望，安理会将继续倡导加强有关气候问题的分析和信息。

我们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已开始在第2349（2017）号决议就西非和萨赫勒开创的先例的基础上，将气候问题纳入其国家和区域工作。在乍得湖流域（其90％的经济依赖农业和畜牧业）等地区，不言而喻，日益恶化的气候将对和平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可被恶意行为体利用的脆弱性并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

我们还欢迎安理会将关于气候的类似措辞纳入其关于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马里、索马里及达尔富尔的决议中。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多：除了要求各国政府和联合国解决气候变化的影响外，安理会还应鼓励采取措施，以防止和减轻其作为冲突本身的根源的影响。安全理事会还应具体处理妇女和年轻人等边缘化群体，她们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例如由于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而受到不利影响。

在利比亚、南苏丹、也门及叙利亚等国局势中，气候变化增加了极端天气模式，从而加剧了人为冲突的严重性。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将其对气候的审议纳入其决议的主流，同时继续把重点放在造成和实施这些冲突的责任方身上。

展望未来，我们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为在迄今为止和平的地区发生冲突创造条件。北极夏季冰融化刺激对资源的激烈争夺，而开发资源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并造成北极环境进一步退化。对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关注给包括北极理事会在内的区域机构带来挑战。我们还应该提到争夺资源对北极地区土著人民的影响，他们与其历史土地、领土及资源的关系应该受到尊重。

对于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变化是一种生存威胁。其影响，如

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失去家园和生计，与安全理事会在日常工作中处理的那些武装冲突的结果如出一辙。鉴于这一现实，安理会应将气候变化作为对我们全球集体安全的直接威胁来对待。

最后，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行动均须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体现的我们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为基础。我们必须推进《巴黎协定》的精神，并雄心勃勃地共同努力推出有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由于名单上仍有51位发言者，我借此机会提醒各位代表将发言限制在三分钟、或最多四分钟内。

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人提供的宝贵意见。

在2017年12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日本主持了一次关于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包括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在内的复杂挑战的讨论。

正如我们在那次讨论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复杂的挑战，安理会需要更加注重整个冲突周期，即防止冲突的爆发、升级、持续及再次发生。

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因素密切相关。气候风险，包括可能成为威胁倍增因素的灾害，尤其正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增加。正如卡巴特先生在其通报中所提到的那样，日本本身在去年7月遭遇了创记录的暴雨。

因此，适应措施的重要性也在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正在20国集团框架内领导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讨论。我们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持续提供援助，包括通过进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和气候风险信息发展，直接为建立有能力应对与气候有关的风险的社会做出贡献。

日本本身就是一个易受灾害的国家，一直致力于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国际舞台的主流，包括指导通过了《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根据《仙台减少灾害风险合作倡议》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有形和无形援助。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每个政府应将减少灾害风险作为政策优先事项，将减少灾害风险的观点纳入所有发展政策并扩大对该领域的投资。按照这些政策进行的集体努力，包括持续讨论、资源调动以及规划和实施应对新出现的风险的措施，可以导致构建一个有复原力的社会。

我们认为，在全球减少灾害风险意识的支持下，这种努力最终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会。我谨表示，我们继续致力于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推进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包括在联合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塞奥菲利夫人（希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这场极具现实意义的及时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要作的发言，并谨补充以下几点意见。

最新科学数据表明，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健康、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了迅速增加的风险。实际上，它的影响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偶然事件，而是当下的现实。在我国希腊和整个地中海区域，灾难性的森林大火、不断减少的水资源和持续越来越久的季节性洪水对重要的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构成了严重威胁。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和频率不断增加，不仅制造新的威胁，还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社会和跨国界紧张局势。显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受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缓解这些影响需要加强多边合作。本着这一精神，希腊签署并批准了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的重要公约。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当前的谈判，并支持

欧洲联盟雄心勃勃地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安全影响。

我们认为，最近经过改革的灵活的联合国架构——再加上它注重长期分析、交叉影响和面向国际安全的新颖整体办法——具有应对这些挑战的独特资源。我们的第一优先事项应该是增进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共同知识和情况认识，随后一致将其纳入我们的预警和预防冲突机制。加强和协调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工作可以成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第一步。

今后，对于我们扭转气候变化的长期努力而言，我们预测和适应其安全威胁的能力可能同样重要。有鉴于此，我们期待今年将由秘书长主持的气候峰会。不作为并不是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拉脱维亚代表发言。

贝德高维奇斯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组织今天的辩论会。主席先生，贵国直接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这种视角给了我们一种特别的紧迫感。我也感谢所有通报人在这方面汇报了有用的最新情况。

拉脱维亚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要作的发言。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毫无疑问，它还影响地缘政治稳定和安全，也起到倍增威胁的作用，特别是对最脆弱的地区而言——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冲突。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威胁到整个区域的人口和稳定，尤其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南亚、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我们非常清楚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拉脱维亚热烈欢迎安全理事会现在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应被纳入安理会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努力的主流。加深我们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的理解，将有助于各国和个人加强气候行动。我们还赞扬秘书长坚定致力于将气候变化置于联合国议程的优先位置，尤其是今年，为9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做准备。

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也变得更加严重。去年夏天，我们再次目睹了世界各地创纪录的高温。和其他国家一样，拉脱维亚正在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拉脱维亚的平均气温记录显示出长期变暖的趋势。每一场风暴都会给沿海地区的人们带来洪水和巨大灾害。波罗的海的海岸线侵蚀威胁今后可能会加剧。只有借助共同的多边努力与合作，才有可能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建设复原力，通过更好地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包括更频繁的气候灾害——做准备，从而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行动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工作有着明确的联系。拉脱维亚坚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最根本的预防议程，因为这些目标涉及不稳定和冲突的驱动因素及根源。因此，对人的尊严、消除贫困、增强气候适应能力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投入资源，将减少冲突、不稳定和绝望情绪。

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提供了清晰的指南，告诉我们必须采取哪些行动，以免为时过晚。拉脱维亚充分致力于该协定的长期目标。拉脱维亚今后的义务是履行欧洲联盟国家作出的坚定承诺，即与1990年相比，到2030年要共同减少至少40%的温室气体排放。拉脱维亚正在制定《2050年国家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和《2030年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计划》。此外，拉脱维亚正在制定2021-2030年期间的详细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在区域一级，拉脱维亚目前担任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主席，将气候适应和低排放发展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视为优先事项。我们将促进《巴黎协定》在该框架内的有效落实。我们还将聚焦于波罗的海的污染问题。过去十年，化学污染和塑料废物已成为波罗的海流域生态系统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威胁之一，需要立即加以解决。

拉脱维亚坚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找到具体解决办法，是各级的共同责任。然而，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至关重要，特别要向私营部门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推动对绿色经济的创新和投资。这将需要部门政策，尤其还有人们的心态，作出许多改变。

去年12月，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通过了一套平衡的决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充分执行这些决定，以使《巴黎协定》产生实效。现在，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用秘书长的话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决定性时刻”。确实如此，我们的星球正处于存亡之际。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深入关心的问题。我们必须为后代采取措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斯特凡尼莱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意大利欢迎今天的辩论会。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要作的发言。

在今天的讨论之前，安全理事会成员自2007年以来已组织了一系列关于气候与安全之间关系的各种会议。意大利通过定期出席会议，通过在2017年的上次安理会成员任期内推动召开一次关于气温上升对安全影响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不断地推进这股势头。因此，我们非常赞赏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倡议，它确保了讨论的连续性，并确认越来越多会员国决心让安全理事会继续关注这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议题。

正如秘书长所言，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也对人类和地球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威胁。在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从萨赫勒到中美洲和加勒比，从东南亚到太平洋，以及在地中海区域，我们已经在目睹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后果。飓风、干旱、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状况可被视为对全球安全构成的各种新形式自然威胁，因为它们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取水和粮食的机会、卫生保健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如萨赫勒国家、乍得湖流域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而更易面临陷入脆弱境地的风险。但是，就人道主义危机、局势动荡、资源促成的冲突、被迫流离失所以及移民流动而言，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后果对整个地球的安全产生迫在眉睫的直接影响。

国际社会实施干预的首要方面显然与预防和缓解这种灾害有关。减少气候相关灾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根据《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指标遏制全球排放量的能力。尽管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第二十四次缔约方会议取得了进展，但要实现这一至关重要的目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大会主席推动下将于3月28日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以及秘书长将于9月23日召开的气候峰会，将有助于加强和加快所有层面的国际行动。

与此同时，必须加强适应、防灾和应急准备方面的全球努力。这一领域的主要政策文件是《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意大利政府全力支持切实执行该《框架》。

意大利本身是一个高危国家，经常遭受地震、洪灾、滑坡、火山爆发及其它突如其来的事件。鉴于这种脆弱不堪性，意大利在保护平民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长。我们渴望分享这种专长，并积极支持地方和国际伙伴建设和发展应对自然灾害的国家能力。

就非洲而言，我们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及津巴布韦开展工作，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在萨赫勒地区，意大利大力支持《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我们将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合作，于下周一在罗马启动新的非洲气候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以促进粮食保障、清洁水和能源方面的援助项目。

意大利还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勒比共同体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建立了创新伙伴关系，重在加强国家在气候相关问题上的能力。

我们了解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内容和特点，同时我们认为，安理会也应发挥其作用，与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开展协调，有系统地将气候相关影响的安全层面纳入其分析和审议工作，包括对国别局势的分析和审议。

我们面临一项全球性和多层面的挑战。因此，所有相关的国际行为体和机构以及国家当局和私营部门都必须采取协调一致、包容各方的做法，拿出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伊姆兰·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特别感谢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外长主持会议。我还要感谢通报者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这一问题。

今天的会议表明，我们大家都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世界当前面临的一项最大挑战，气候变化确实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有可能决定着我们的讨论、商业和资金流动尤其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前景。

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气候变化是促使威胁倍增的因素。除了可悲的人力和物质代价之外，气候引发的威胁阻碍我们实现国家优先目标、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增长以及确保我国人民经济繁荣的能力。对气候变化责任最小的国家受害最大，这也是当今时代的一种窘境。例如，巴基斯坦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世界最低，可是，我们却是世界上第八大最脆弱的国家。我国是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在大河周边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一个下游国家，我国正遭受水资源吃紧之害，这有可能摧毁巴基斯坦乃至整个南亚的粮仓。

我们地球的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是气候引起的，这并非什么秘密。安理会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讨论这些威胁。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最新报告也确认，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对人的安全构成的相关风险将增大。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以避免冲突。我们认为，解决办法是消除气候变化的根本起因，因为我们光是治标，就无法治本。

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以科学证据为支撑的原则和框架。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体而言，我们必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转让技术、建设能力和筹措经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我们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必须确认依照相关公约制定的长期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后，我们还认为，应该根据相关机构的任务授权就此问题采取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发言。

奥扎大主教（*以英语发言*）：罗马教廷感谢主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如何应对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秘书长说过，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我们目前正处于决定性的时刻。正因为如此，本次辩论会颇为及时。

气候相关灾害影响到所有国家,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是如此。在世界各地，从加勒比到太平洋，我们都目睹极端天气条件造成的影响。过去一年，暴雨、洪灾、火灾、地震及干旱给世界不同地区，包括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的居民带来巨大痛苦和苦难。

除了这种极端气候变化造成的可悲生命损失和这类灾害带来的巨大经济代价之外，还需要提高敏感认识，积极行事，防止在国家和区域的稳定因无法获取粮食和清洁水受到影响后接踵而至的过于频仍冲突，及其势必对民众的流动产生的影响，这有时会导致被迫流离失所和长期流离失所。

只消回顾一下季节性游牧现象如何加剧紧张局势，就足以说明问题，农民和牧民因争夺有限或日益减少的资源，相互间的纷争加剧，在有些情况下成为导致不稳定的又一个因素。例如，长期以来，乍得湖流域一直为数百万民众提供在沙漠中生活的源泉，由于持续不断的区域冲突和极端主义扩张的威胁，我们面临着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难以找到水的局面，更不用说对渔业的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困，使本已极度脆弱的人口陷于更加绝望的境地。

如果说极端气候灾害确实不分对象，这些例子则表明，最贫穷者付出了最大代价。根据最近的研究，较贫穷国家的民众因极端天气流离失所的可能性是较富裕国家民众的五倍。我们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防止我们共同家园气温上升的多重后果，还要消除可预防的气候灾害引起的和平与安全关切。这些行动属于方济各教皇大力促请国际社会和我们每个人进行生态转变的一部分。

本次公开辩论使我们有机会认真审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拿出雄心勃勃、连贯一致和注重行动的解决办法，以表明对地球的尊重和所有人的整体发展的关注。新年伊始，方济各教皇向派驻罗马教廷的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希望各国做出更果断的承诺，加强合作，紧急遏制令人忧心忡忡的全球变暖现象。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亟须提供支持，以利于开发基础设施、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大前途，使社会最弱势阶层得以解放，以免他们因为我们没能采取行动而被迫为争夺粮食和水开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朴哲珠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集今天的公开辩论。我还要感谢四位通报人的通报。关于今天的辩论主题，大韩民国谨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安全理事会务必系统地、以与我们加强预防性外交的努力相一致的方式理来解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实际上，对冲突根本原因采取综合办法是预防性外交的核心所在。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国家中，气候变化本身对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在其他地方，日益明显的是，气候变化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正在制造区域不稳定并将其推向全面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正如在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的局势中所报道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在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的情况下而为这种情况设计基本解决方案是有局限的。

第二，为了阻止气候变化进一步升级为安全挑战，我们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全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跨领域问题。但是，目前的联合国系统是分散的。因此，联合国需要深化协作和协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多方面安全问题。上周，古特雷斯秘书长在非正式会议上向大会通报时正确地指出，气候变化是今年联合国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全系统的努力中也不例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去年建设和平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气候变化对萨赫勒地区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影响的联席会议是这方面的一项有意义的努力。大韩民国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现任主席，将努力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以促进关于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的综合讨论。在这方面，我们本周在执行局就消除贫困，包括与气候有关的贫困问题，以及加强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联系的方法举行了一次深入的互动对话。

第三，安全理事会的有关讨论应该带来实际成果。我们注意到2011年的主席声明S/PRST/2011/15，其中请秘书长在其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列入关于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的资料。我们还提请安理会注意去年的主席声明S/PRST/2018/3，其中强调需要关于萨赫勒地区此类风险的气候风险分析和管

理战略。我们希望继续讨论采取后续措施的具体方法。

为了防止气候危机进一步演化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国际合作和对脆弱国家的支持至关重要。有必要同时提供发展和治理能力支持，同时支持气候适应力。为此，大韩民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支持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桑多瓦尔·门迪奥里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就国际议程上的这一相关专题召开这次公开辩论。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最近指出的那样，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是努力保护人类的同义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秋季特别报告中所载的科学证据是清晰、有力和令人震惊的。提高我们的决心是解决这一现象的关键，我们目前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距离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目标还很远。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并将继续作为墨西哥政府的国家和国际优先事项。自我们在墨西哥坎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它为我们目前的所有谅解奠定了基础--以来，我们选择了具有约束力、雄心勃勃和充满活力的制度，它今天体现在《巴黎协定》中，《框架公约》是谈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在这方面，墨西哥支持并感谢秘书长今年举行一次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会议。

必须从分析上区分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范围，以便确定联合国系统内能够予以应付的有关机构，从而确保我们的努力真正连贯、协调、有效和高效。安全理事会必须表达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关切；我们希望它重申，在这方面，《框架公约》是协调行动的适当场所，来处理其缓解、适应、损失和损害、气候融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柱等的原因和效应。

避免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最佳方法是处理其结构性原因和脆弱性因素。为此，我们必须遵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落实为建立复原力和促进国际合作。讨论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联系的问题通常反映了前者的影响，其中许多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关，包括流离失所、移民、粮食安全、水短缺、能源生产和流行病等等发展挑战。换言之，气候变化对人口的间接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是冲突的出现和加剧的风险因素。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种现象增加了脆弱性，但它并不是许多国家所经历的体制和结构脆弱性的深层原因。这不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重新组合为确保安全的方法的问题，而是要认识到其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每天都在加剧，同时影响国际关系和安全。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和安全之间联系的讨论必须始终基于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情况。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给予它们全面和充分的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必须逐案作为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进行风险分析的一部分，同时保持基于可持续发展和脆弱性的渐进方法。

地球的任何部分都不免受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改进各种机制和办法，成功管理它们所代表的风险并予以避免。幸运的是，这种分析已经开始被纳入一些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中，其中承认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风险因素。在审查安理会议程上的各种冲突时，应欢迎采用这种办法，使其成为支持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和建设和平的分析资源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维持和平的方法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广泛、必要和完全相关的范式转变。正是和平而非冲突必须成为预防的参考点，并且是利用现有的所有资源和工具促进获益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社会的动力，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因此，应对其影响的最佳方式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以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在考虑将这一主题列为安全理事会常设议程项目之前，我们必须拥有可靠和严格的分析工具，为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提供信息和支持，并因此可以纳入这样的观点。联合国系统内分工明确，是解决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最佳途径。

综上所述，至关重要的是，作为本组织主要机关之一，安全理事会应重申其作为整个系统协调努力的贡献者，而不是单独或孤立地处理这一联系的机构的作用。同样，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应利用并适当辅之以处理本组织议程上的跨领域问题，如移徙、粮食安全及减少灾害风险等问题的工具和程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切希尔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首先，新西兰赞同瑙鲁代表将代表太平洋岛屿论坛所作的发言。

去年9月，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确认，气候变化对太平洋人民的生计、安全和福祉构成了唯一最大的威胁。我们各国领导人审慎地选择了他们的言辞。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将被无休止地讨论的未来挑战;它是眼下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明显的联系。当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环境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就会引发不稳定和冲突。本次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19/1，附件）中概述的问题是本区域各国的现实。

如同在全世界一样，与气候有关的灾害正在太平洋地区增加。旋风、风暴潮及干旱正在增加整个地区各社区的脆弱性，并威胁到来之不易的发展。

太平洋国家也已经感受到缓慢发生的灾害的影响。海平面上升是低洼环礁国家面临的最明显风险，但海洋变暖、海水酸化以及淡水供应和农业土壤的盐污染只是气候变化给我们地区带来的许多复杂挑战中的一部分。

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一些人移徙，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在其本国内移徙。对于那些面对逼近的海洋而被迫放弃土地的社区来说，没有任何返回的可能。这种流离失所并非异常现象;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它将是我们的共同未来。

作为安全理事会预防冲突努力的一部分，应该查明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并在威胁出现时加以应对。新西兰坚决支持秘书长努力确保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作出更加协调和综合的反应。为了帮助进一步协调和注重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努力，我们完全支持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任命一位气候变化问题高级代表的提议。

此外，我们同今天发言的其他人一道鼓励秘书处通过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报告中纳入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关分析和风险评估，使安理会能够全面应对这些威胁。正如秘书长所说，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它对生计构成威胁，对福祉构成威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阿克巴鲁丁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气候变化是对全球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提供机会就这一首要问题的具体方面发表意见。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发表了看法。

印度认为，气候行动应成为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全球机构应该对感受到的人类需求作出反应，包括备灾以及面对灾害时抗灾和救灾。这种现象往往威胁到人类福祉。此外，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那样，在如海平面上升等一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发生暴力和冲突，国家的完整性也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来看，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关于人类安全的

章节所总结的那样："有关气候变化和气候可变性对暴力产生的影响的证据受到质疑。"

因此，虽然气候风险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显而易见，但关于气候灾害与安全之间存在普遍联系的研究结果仍然模棱两可。

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是复杂和偶然的，对此仍然有争议。作为想要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者，我们面临两难困境。我将强调这方面三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首先，能否通过快速解决使气候变化安全化的问题来应对与气候有关的灾害来实现气候安全？国际和平与安全考量往往胜过其它考量。因此，将一个问题定义为安全挑战通常会增加注意力和资源以专门解决它。使气候变化安全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但安全化也有重大不利因素。当合作显然是应对这一威胁的最有效途径时，安全化方法却可能使各国陷入竞争。从安全角度进行思考通常会产生过于军事化的解决方案，用以解决本质上需要以非军事对策加以解决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会带来错误的行为者。俗话说，如果你拥有的只是一把锤子，那么一切东西看起来都像一颗钉子。

第二，用来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程序和解决方法是否适合应对与气候有关的灾害？换句话说，通过强制行动能够实施缓解和适应战略吗？那些将安理会的反恐和防扩散行动列为惩罚性措施途径的人能否解释一下哪些"其他国家"要对气候灾害负责？是那些不按照《巴黎协定》作出国家自主贡献的国家吗？那些不提供气候认捐款的国家会被迫提供这种支持吗？或者是会回避令人为难的真相吗？

第三，是否可以通过将气候立法从包容性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转变为一个在结构上无代表性的组织的决策来满足气候正义的需求？仅通过安理会的一项决定作出的这种改变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和《巴黎协定》，以及对目前正在参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其它多边机构，乃至对多边立法的破坏性影响是真实的。

我们赞同采取谨慎方法处理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印度支持走一条促进合作以实现我们预防和解决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严重灾害的共同目标的道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合作开展气候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桑托斯·马拉韦尔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面临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的岛屿国家和加勒比国家，组织本次辩论会。多米尼加共和国拥有悠久而丰富的环境政策传统。因此，其经验有助于促进安全理事会将气候层面纳入其和平与安全战略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加强其预防职能方面。

众所周知，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正因如此，我国非常重视审议气候变化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在最近即2015年和2016年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推动了此种辩论。当时，我们与马来西亚和安哥拉共同组织了数次阿里亚办法会议，并与埃及一起推动了一次关于荒漠化问题的通报会。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安理会近年来一直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注。

科学证据一再提醒我们——最近一次是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中，气温上升将导致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持续的干旱、自然生境遭到不可修复的破坏以及许多人无法承受的海平面上升等现象，从而造成不堪忍受的后果。这些变化又严重损害了粮食安全、饮用水供应和数十亿人的健康，有可能迫使人们大规模地踏上移民之路。简言之，气候变化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国际和平与稳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并在安全领域采取行动。

西班牙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本国优先事项之一。生态转型部的设立清楚地表明，我们坚定地致

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致力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对我们的系统进行彻底改造，使其适应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西班牙政府首相上周宣布了一项将在未来10年内筹集2.35亿欧元资金的能源和气候计划。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各国不在自己做出努力的同时开展必要的国际合作，它们的努力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本着这一信念，西班牙在总部这里加入了“碳中和联盟”，该联盟致力于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我们正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期待着秘书长召开气候峰会。

我们支持将气候问题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不论是将气候变化完全视为可持续发展范畴的问题，还是对气候变化会使不稳定因素倍增这种情况视若无睹，这两种行为都是严重缺乏责任感的体现。安理会需要为自己配备一个风险评估系统，并制定相关战略，在分析情况以及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时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西班牙已将气候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纳入2017年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明确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已成为武装冲突的结构性原因”。简而言之，它确认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这一现实在国家层面得到应有重视的理由越来越充分，紧迫性也日增，那么它也应该在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多边层面得到应有的重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帕伦蒂先生（以英语发言）:候选国阿尔巴尼亚、黑山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稳定与结盟进程国及潜在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均赞同这一发言。

欧洲联盟(欧盟)赞扬多米尼加共和国倡议举行这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一重要议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担任轮值主席，为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如施泰纳先生今天上午所提及的那样，世界经济论坛在其最近发布的《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令人关切的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在最有可能发生的五大风险中占了三个，在影响最严重的五大风险中占了四个，这证实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特别报告《全球变暖1.5摄氏度》中关于国际社会所面临挑战的规模的结论。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世界许多地方的粮食安全、生态系统、生计、供水以及农业等重要经济部门造成严重影响。对于争夺日益稀缺资源的冲突、不稳定局势以及国际和国内流离失所来说，气候变化是威胁倍增因素，尤其是对灾害发生期间及之后缺乏建设必要的抵御和应对灾害能力的脆弱或动荡的国家和区域而言。

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需采取各种措施才能有效预防、减少和解决这些联系。有鉴于此，必须综合施策。《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将改善治理、维护安全和建设复原力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欣见，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最新报告反映了气候和环境风险。

所有国家都应评估气候和环境风险及其对社会经济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此种评估工作尤其必须成为局势最为脆弱的国家的优先事项。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抵御和防备灾害的能力，从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执行工作。

必须进一步开展工作，以确保在分析风险时适当顾及相关的气候和环境风险，为安全理事会决策提供依据，并且必须将此类风险纳入预警系统，从而加强安理会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支柱间合作不可或缺，因此，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对安全理事会所起的咨询作用日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应牢记，在灾害期间及之后，妇女和女童努力寻找满足其家庭成员和自己的食物及其它基

本需求的机会，因此，她们面临更大的风险、负担和不利影响，包括更高的遭受性别暴力的风险。增强妇女权能，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可以增强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措施必须注重促进性别平等，考虑到土著知识系统，并尊重人权。

第一步是，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联纳入国家、区域和多边各级战略层面的政策框架和实用指南以及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愿审查。长久之计是，必须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资源共享国之间必须密切开展合作，这样才能减少相关的国内或国际冲突风险。

根据《巴黎协定》及其后的共识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例如，在秘书长即将召开的2019年气候峰会上这么做——必须继续成为我们共同承诺的基石。欧盟深信，在这方面必须采取多边行动，建立各种伙伴关系，标本兼治，推动合作。我们与全球的伙伴密切合作，加强我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遏制环境退化、管理灾害以及应对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共同能力。

欧盟通过各种方案，支持采取措施，以综合性方式加强世界各区域抵御灾害的能力。例如，我们正在根据“Euroclima+”方案，在18个拉丁美洲国家促进对气候有适应能力的发展，重点关注最弱势群体。同时，我们与伙伴在去年的”一个星球“峰会上发起了新的太平洋倡议，以期在19个国家和海外领土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提高其抵御灾害的能力。还围绕能源和气候等六个优先领域成立了“萨赫勒联盟”，目的是加强捐助方之间的协调，以促进该区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欧盟的哥白尼卫星成像技术被用于在极端天气事件之类的灾难发生后实施的即时救生行动。例如，在2017年飓风“哈维”和“艾尔玛”过后，该技术为挨家挨户搜寻幸存者提供指引。它还为长期准备应对危及沿海社区生计甚至生存的气候影响提供依据。

我们相信，通过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采取坚定和有针对性的行动，我们可以降低发生气候相关灾害的风险，并确保更好地应对其影响。通过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消除世界许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重大风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巴多斯代表发言。

汤普森女士（巴巴多斯）（*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 14个成员国发言，加共体赞同伯利兹代表今天晚些时候将以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加共体坚信，和平、安全、发展和可持续性之间存在联系——这是一种现在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微妙平衡。不能让这一对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构成的威胁放任自流，需要在国家和多边层面采取整体战略性应对措施。

我们谨指出：第一，加共体坚持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仍然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现象的主要机构。第二，虽然对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真实的，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加勒比次区域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威胁其生存的漩涡之中，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应对措施，包括风险评估、规划以及为复原力和能力建设提供适当资金。第三，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应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所有风险。事实上，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国际和区域各级的全体行为者，以支持各国减轻这些安全风险。

《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具有历史意义，但正如秘书长上周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没有在卡托维兹出现逆转，但这一事业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因此，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其根据《巴黎协定》作出的筹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承诺，并为实现1.5° C的目标而做出刻苦和紧急努力。

7月，加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一项关于气候变化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呼吁全球努力缩

小减排目标差距，使世界走上低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道路。他们还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加勒比正在进行的努力，以便为全球减缓气候变化作出贡献，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建设我们区域的复原力，从而减轻和管理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的真实风险，并支持该区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气候智能型区域。

整个联合国系统需要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如何威胁和平与安全并助长冲突。只有到那时，气候政策才会支撑所有其他发展规划和举措。如果不解决气候变化的推动因素，我们就无权哀叹移民趋势会威胁安全。我们绝不能将水资源综合管理和一般资源规划置于气候变化的背景之外。我们不应忽视资源稀缺的历史及其与冲突和战争的关系。我们怎敢对海平面上升淹没海岸对海洋边界的潜在影响以及对冲突和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视而不见。当气候影响使发展目标遥不可及之时，我们不应奢谈全球和平、安全或可持续性。

将相关分析纳入秘书长的定期报告、风险评估和预警至关重要。因此，加共体国家感兴趣地注意到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7月11日在安全理事会关于气候安全风险的公开辩论(见S/PV.8307)中呼吁任命一名气候与安全问题特别代表，此人不会扩大安理会的任务授权范围，而是为秘书长服务，填补联合国系统的一个重大空白，同时向安理会提供它非常需要的信息。加共体还支持关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自然灾害造成的气候变化安全威胁的呼吁。

最后，加共体再次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召集这次重要对话，讨论安理会如何在安全方面应对气候风险，如果它应该这样做的话。对加共体来说，这再次有力地提醒我们，在我们大家发现自己的问题远远超出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后果的能力之前，我们必须通力合作，认真应对气候变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杜阿尔特·洛佩斯先生（葡萄牙）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这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

葡萄牙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刚才所作的发言。

我们听到秘书长警告说

> “我们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迎接气候挑战”。

气候变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直接生存威胁，只有通过所有会员国的参与和合作才能解决。这个现实情况促使我们寻求采取行动并鼓励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更有力地反映气候变化。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所面临的令人担忧的趋势——与气候相关的灾难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代价，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以及海洋的温度和酸性高于以往任何时候。这些挑战需要人们采取紧迫和雄心勃勃的行动。因此，我们赞扬9月份召开秘书长的2019年气候峰会，以及定于3月份召开大会主席的高级别会议。

今天使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在其众多影响中，气候变化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了具体冲击。气候变化是巨大的威胁倍增因素，特别是在本已脆弱的地区。因为争夺日渐减少的自然资源而加剧的紧张局势，为现有的冲突推波助澜。水面上涨、过度降雨和长期干旱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从而增加了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这往往导致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迁移。这些关切反映在2017年《关于星球安全的海牙宣言》中，它特别侧重于萨赫勒区域防治荒漠化和优化国际协调努力。

葡萄牙2013年通过的国防战略概念也处理了这一现实，它考虑到环境威胁和风险，并为加强我们

预防、适应和应对与环境相关的安全挑战的能力铺平了道路。

在2011年11月葡萄牙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安理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的高级别通报会(见S/PV.6668)，会上审议了气候变化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影响问题。

这一辩论自那时以来一直在演变，主要是由于许多会员国作出努力，让这一问题得到重视，其中包括最近于2018年作出努力的瑞典。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将相关的气候和环境风险进一步纳入构成安全理事会讨论基础的风险评估，从而加强安理会的预防冲突作用。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确保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提供支持。安全理事会不能忽视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诸多关联。它应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减少并应对现有的风险。葡萄牙支持对这些挑战采取综合办法，以支柱间和区域间合作为基础，旨在提高复原力和防备能力。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是全面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步骤。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瑟纳尔勒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另一个关键问题。气候变化是一项生存挑战，其对经济、保健和环境的不利和跨界影响对后代构成重大威胁。

近几十年来，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因为它造成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环境退化和对资源的争夺继续在许多区域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还阻碍在安全、稳定和发展方面取得进展。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到2050年，因环境退化而被迫移徙的人数可能高达2亿。2017年，与气候有关的灾害造成数千人死亡，损失达3200亿美元。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将给流离失所者收容国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并给针对流离失所和移徙的现有法律框架带来新的挑战。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反思气候变化对经济和安全的影响。

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受到气候变化和相关安全后果的日益严重影响，尽管它们与全球变暖的肇因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缓慢爆发的危害，如海平面上升以及与极端天气有关的灾害，危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这些情况也对主要从事渔业、林业或农业的那些人的生计产生严重影响。

亟须为这些国家建立并调整系统和全面的抗灾能力建设工具。这些机制必须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和冲突的风险。向这些国家转让技术和专门知识是迫切需要的。应当通过适当的政策和战略来加强地方居民和国家政府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与气候有关的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土耳其愿意并随时准备为这种努力作出贡献。土耳其通过其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优先援助受极端天气事件和灾害严重影响的国家，提供流动医院和援助物资，并部署搜救队，因为此类事件和灾害对民众的生计造成重大后果。

在气候变化方面，土耳其也位于一个脆弱的区域。该区域受到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全球变暖导致降水量减少，干旱和土地退化加剧，2017年是过去44年来干旱最严重的一年。因此，预计到2030年，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水资源紧张的国家。土耳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为了向其公民提供一个低碳密度的环境，土耳其努力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目标纳入其发展政策，宣传能源效率，增加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

正如秘书长所强烈警告的那样，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而且其变化速度出乎我们的预料。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需要全球合作与公平分摊负担。《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生效及其规则手册的批准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土耳其为谈

判作出了积极贡献，以期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然而，只有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和公平的原则基础上，才能成功执行《巴黎协定》。作为一个面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严重脆弱性的国家，土耳其仍然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星球，并在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平等的条件下克服这些挑战。

今天的辩论会再次证明了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两者之间的各种关联。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相关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感谢主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把重点放在这一重要问题上。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法弗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我们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组织关于一个关键议题的本次辩论会。瑞士欢迎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与气候有关的灾害与和平与安全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问题。我们确认，迫切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步骤，以限制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清楚地表明了气候变化的全球层面，其影响因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而有所不同。瑞士也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在我们区域2018年的热浪中，莱茵河上的航运——对我国经济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因高温、降雨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低水位而受到严重阻碍。这就中断了进出口贸易，使得内陆的瑞士获得燃料等重要商品的机会受到限制。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气候变化的加速将对人类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事态发展危及我们的集体稳定与安全。

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瑞士通过了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此外，瑞士委托对现有气候变化和安全措施进行影响研究和评估，以执行保护其人口所需的适应措施。瑞士对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关切体现在其国际承诺中。例如，瑞士于2010年发起了《蓝色和平倡议》，旨在加强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跨界合作。

我们注意到，气候变化也影响到人的安全，即个人在经济、保健和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物质和非物质安全。为了减轻这些影响，重点应放在预防上。这就要求预警机制有系统地确定气候变化作为风险加剧因素的情况，以便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两点上。第一，安理会必须有系统地将气候风险纳入其议程上的区域和国家局势。第二，安全理事会必须能够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内现有的信息和资源。气候数据收集、气候情景和预警机制已经存在，目前正在成功应用。因此必须在联合国内，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内，交流这种知识并利用协同作用。应当建立有效协调，使气候变化和安全议题能得到适当处理和解决。

最后，我们必须采取系统性积极措施，包括在安理会采取这类措施，以便在气候脆弱性、极端灾害和慢性危害等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具体灾害背景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绝佳机会是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平台将于5月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博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重要辩论会。澳大利亚欢迎这次讨论。

我们赞同瑙鲁代表将以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正在给社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也造成粮食、水和能源短缺。随着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我们必须随时准备解决气候相关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已经承诺，在五年里至少为发展中国家支出10亿美元，以加强抗御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挑战的能力，其中3亿美元直

接用于太平洋区域。作为太平洋区域最大的双边捐助者，我们通过方方面面的援助方案，包括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粮食及水安全援助方案建设抗御力。

去年9月，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通过了《关于区域安全的波伊宣言》。《宣言》承认气候变化仍是太平洋地区人民的生计、安全和福祉面临的最大威胁。为帮助落实《波伊宣言》，澳大利亚正在与太平洋伙伴合作，以建立一个太平洋信息汇总中心，此举将加强区域信息交流和分析，并利用气候数据和灾害分析，为应对共同安全威胁提供信息。澳大利亚还在建立一个2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该机制将与太平洋地区伙伴合作，建设能源、水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关键基础设施。这将扩大我们数十年来为实现高质量的太平洋气候和海平面监测工作提供的支助，以及灾害事件后提供的重要人道主义援助。

澳大利亚认为，我们必须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采取一种长期发展观点，我们承诺帮助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落实《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自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2009年建议让减少灾害风险发展援助达到官方发展援助的1%以来，我们的减少灾害风险发展援助始终超过这一目标。作为该项承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期待在2020年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共同主办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我们的发展援助投资是澳大利亚做法的核心内容。我们通过气候和灾害风险筛查、气候和防灾新投资以及设计方案，确保即便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也能取得发展成果。我们还执行强制性保障，以确保我们在实施海外方案时对环境进行保护。《仙台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相辅相成。挑战在于将这三个框架之间的政策一致性付诸实践。

澳大利亚认识到，全球和国家减少排放和限制变暖的努力必须成为我们方针的核心。去年在波兰通过了《巴黎协定》规则手册，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它重申必须通过有章可循的秩序，以全球解决方案应对全球风险，并提供一个框架，让《巴黎协定》焕发活力。联合国系统其它部分必须配合这些全球和国家努力，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处理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澳大利亚欣愿有机会协助联合国系统很多重要部门齐心协力实施一种集体对策，应对这些紧迫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发言。

佩雷拉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不仅祝贺它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国，还祝贺它就我们当代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作为一个遭受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岛屿国家，斯里兰卡了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各国面临的挑战。我们也感谢所有通报人今天上午在这里所作的宝贵发言。

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观察到，过去三四年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年份。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继续攀升，加剧了发生热浪、水灾、干旱和野火的风险。海平面不断上升和沿海环境退化威胁着低洼地区的生命和生计。愈加频繁的洪灾和海水淹没领土的风险导致更普遍的流离失所、移民和社会动荡。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岛国特别容易受到海洋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斯里兰卡因洪水、滑坡、2004年大海啸和其他灾害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惨剧而遭受重创。

对斯里兰卡而言，海洋及其资源与我国人民的生活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我们地处的印度洋为我们提供了就业、食物和商贸通道。对我们的广大沿海社区来说，海平面就是生命线。对我们来说，海平面上升、海洋污染、鱼类枯竭和良好沿海生态系统，这些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我们的生存之本。

只有遵守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原则，通过承诺和多边合作落实一项全球构想，才能制止地球退化和由此对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威胁。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团结至关重要，不仅对在各个层面和阶段——从预防到灾后管理——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对提供长期和短期灾害救济至关重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他文书是系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规范性框架。斯里兰卡继续大力支持《巴黎协定》。实际上，我们支持每一项重要国际环境协定。我们希望，这些文书所体现的集体利益将成为就气候变化及其全球影响达成全球共识的基础。

气候变化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在若干方面已经显而易见。其中有威胁倍增问题。气候变化使威胁倍增，因为它造成某些最必要的自然资源稀缺。如果抗御力低下，一些族群可能在国内流离失所，会有更多人被极端分子利用。对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竞争加剧，可能使现有冲突火上浇油。就日益增加的移民、难民流动和人口内部变化而言，环境退化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安全也是推动移民和难民流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恐慌，导致某些国家变本加厉地散布反移民言论，乃至封锁边境，从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关于当地资源竞争，据媒体报道，全球变暖导致全世界每年有大约40万人丧生——很多是由于极端天气事件，但大多数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饥荒和疾病。自然资源竞争和粮食短缺有可能加剧区域动荡或国内冲突。

关于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和灾害的国际对策，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有可能加剧也有可能缓解冲突风险。在提供灾害救济时，必须尊重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以及人道、中立、公正和不歧视原则，这是第三国针对发生在另一国的自然灾害采取行动的立足点。背离这些原则可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并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公正的原则特别重要，可确保那些提供灾害救济的人在开展活动时怀着以下唯一目的：根据人道主义原则，而不是为了干涉受灾国内政而应对灾害。

在此背景下，必须铭记，国际合作决不可减少受灾国在指导、控制、协调和监督救济援助方面发挥的首要作用。对于受灾国对属于其管辖范围内人员负有的压倒一切的职责，国际合作必须始终是一个补充。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造成怨情并加剧冲突风险，而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行动能够成为建设和平与增强复原力的跳板。

在此框架内，国际法委员会最近就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保护人员的问题所开展的工作表明，既要确认受灾国在向本国人民提供救灾援助方面发挥的首要作用，同时也要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在向受灾国提供灾害救济作为真正人道主义措施方面的价值，必须在这两方面保持适当的平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冈萨雷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为支持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散发的概念说明（S/2019/1，附件）。

本次辩论会是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举行的，在这一年，我们将举行有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的秘书长气候峰会，以寻求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大会主席呼吁进行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对话、以及将审查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方面所取得进展的高级别政治论坛，都在强化这一努力。除了就这一现象及其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密切关系交换看法外，这些活动还将推动优化应对这一威胁的全球努力。从气候行动角度看，未来十年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不以坚定和协调的方式直面这一现象，那么实现为2030年设定的目标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科学清楚表明，目前各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下作出的坚定贡献并不足以将到2030年的气

温升幅限制为1.5° C；由于气候变化，位于南半球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正如为本次辩论会编写的概念说明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及其灾害风险是全球性的，但也有区别。拉丁美洲区域，包括哥伦比亚，极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就我国而言，这归因于其高度生物多样性、地理位置和具体发展挑战。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越来越猛烈和频繁，造成巨大的人员、经济和环境损失，就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至2011年期间，拉尼娜现象给我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2%。然后，2015年至2016年期间，我们遭受了厄尔尼诺现象之害，其猛烈程度在历史上排名第二，其灾难性效应造成森林大火，水资源匮乏，还有许多农田受到影响，导致粮食价格急剧上涨。

因此，适应气候变化是我国和我们区域的优先事项，因为这是减少我们脆弱性的唯一途径。然而，要减少这一现象的影响，就必须实质性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加强执行措施，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并调集财政资源、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以期加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和办法。

我国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重视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还认为，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外，大会是就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开展辩论和作出决定的天然论坛。该普遍机构不仅确保包容和全面的做法以及所有会员国的参加，而且还考虑到气候变化与社会和经济层面之间的内在关系。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国充分致力于全面处理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发言。

Rai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在联合国主权平等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定期和始终在安全理事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同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并受权正在安理会发挥作用。多米尼加共和国正在就一个热门问题举行的本次公开辩论会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为此赞扬该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阁下。本次会议非常适当、及时，是该国启动其作为安理会成员任期的极佳起点。

我谨表示赞同瑙鲁代表和图瓦卢代表将分别以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名义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名义作的发言、以及澳大利亚代表、斐济代表和新西兰代表所作的发言。

在我自己的国家，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的不断下沉的卡特雷特群岛上，由于海平面上升，多数民众被迫迁居、流离失所并在国内重新安置。他们在国内重新安置继续受到他们与定居地区民众之间因土地和资源而产生紧张关系和冲突的困扰。这归因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即多数土地归人民而不是政府所有。

在我国北部地区，我们也正看到同样的情况。在那里，由于定期发生火山爆发，马纳姆岛民众流离失所、迁往别处。试想，同样的情况会加剧好几倍，会给和平与安全造成附带后果，并且会跨越国界。这些例子表明，极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以及共同通过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消除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威胁、包括来自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威胁的根源。

其次，我们提醒安理会，当我们在安理会职权范围内谈论国际和平与安全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谈论的是“我联合国人民”的生活和生计。人类基本必需品是食物、水和空气。我们正在目睹，在世界许多地方，由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这些基本必需品质量正在下降、数量正在减少，从而影响无数人的生活和生计。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的最近报告讲得很清楚。因此，必须处理危及所有地方所有人民福祉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状况的所有方面和潜在根源。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怀疑主义者成为我们不将自己从气候变化的持续危险趋势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危害中拯救出来的理由。第三，我们珍视并且欢迎安理会继续就该重要话题展开辩论。但是，我们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员观点之间仍存在不可接受的鸿沟继续表示严重关切。大会第63/281号决议标志着国际社会首次集体承认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该决议专门吁请联合国相关机关加紧努力，思考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它对安全的可能影响。尽管如此，国际上处理气候变化安全影响的协调一致的具体行动依然少之又少。现在就必须加大这种行动的力度，而不是未来。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沿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承认气候变化对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我们促请更广泛地看待该问题，把包括我们所在地区在内的许多其它受其该问题困扰的区域涵盖在内。

最后，也请允许我祝贺比利时、德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南非在安理会就职，并祝它们一切顺利。我们期待与它们合作，以共同推进我们的事业，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今天上午的各位通报人。我想说，从一开始，气候与安全问题就是瑞典过去两年安全理事会任期中的首要优先事项。我们听到许多国家提请安理会根据实地现状更好地推动该议程。今天，我们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但却更显紧迫—当然，不能影响联合国内外其它机构的任务授权。

我们把预防冲突作为起点，把气候方面的安全风险充分纳入我们本国和本地区的具体工作。在我们的两年任期内，安理会明确承认：在多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存在关联。安理会一再强调，必须充分评估风险，以便提高我们预防冲突的努力的有效性。我同意，有必要用一项单独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来承认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有益的。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让我们不要忘记，现有的若干决策重要到足以让安全理事会工作繁忙，在这些问题的跟进方面，应该对其进行问责。我们非常欢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采取步骤，为此构建一个协调机制。我们认为，这是更好地分析气候变化和安全所致共同威胁的一种雏形，有必要在安理会更频繁地运用。

2018年7月，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期间，我们与主席先生今天所做的一样，举行了一次专题辩论，展示出推进该议程得到广泛的跨区域支持。在这方面，我们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接过接力棒，举行今天及时的辩论会。我们现已超出气候变化是否影响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确定与承认。现在的问题是做什么、如何做以及现在就做。

气候变化对安全的一些负面影响已经一目了然，包括水和粮食无保障、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日益频繁以及海平面上升。我们知道，这些现象可导致生命损失、人员流离失所、争抢稀缺资源和社会紧张，它们确实还可引发冲突。世界各国在其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纳入这些威胁这一事实恰恰表明，该问题已变得非常实际与普遍。我们正在进入未知的领域。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特别报告《全球变暖1.5摄氏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地球已经超出其星体的一些极限—我想，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的通报人在他今天上午的通报中强调了同样的问题。当然，这具有尚不可知的深远影响，包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愿就今后如何处理较紧迫的关切提出三点简要的实际建议。

首先，安理会和联合国内外的其它重要决策机构需要气候所致安全风险方面的综合信息、前瞻性

分析以及预警机制，以便能够做出知情的决定。在2011年德国推动的有关气候与安全的主席声明（S/PRST/2011/15）中已经发出这一呼吁，现在必须将其落到实处。

其次，在我们开始更好地了解各种风险的同时，有必要开发更有效处理这些风险的做法，包括通过更新任务授权与方案以及分配资源。我们还必须确保在外交努力、培训与特派团部署以及各种发展政策中顾及适当的风险评估。

第三，在调解努力中，我们应更多地审查气候方面的各种挑战。

为应对气候与安全方面的挑战，我们需要联合国内部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真正的机构性本部。协调机制是重要的第一步，可进一步开发。我们认为，即将于9月份召开的气候问题首脑会议将是推动该议程的恰当场所。

最后，瑞典政府将继续就这项紧迫议程积极合作，在我们过去两年在安全理事会探讨这些问题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包括通过我们对气候方面相关基金的大量捐款和我国减少碳排放的世界领先的政策，该政策现已被载入我国的法律。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本·穆明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倡议讨论气候方面的灾害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彼此关联。我还愿对各位通报人发人深思的通报表示高度赞赏。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可变为重大安全关切。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关于全球变暖1.5摄氏度的特别报告的结论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把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将招致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在减贫、粮食保障以及公共健康领域。

孟加拉国因其地理位置，成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极易遭受气旋、洪水、滑坡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对我们1.6亿民众构成严重威胁，尽管我们对环境恶化的贡献微乎其微。全球气温仅上升1摄氏度和由此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导致孟加拉国大片地区被淹没，还有我们担心的到本世纪末4 000万民众流离失所。每年，我们还因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而损失2%的国内生产总值。气候变化引发的盐化和其它灾害还危害我们的大米和其它作物的生产。除此之外，接纳邻国缅甸110万被迫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也影响到我们脆弱的环境。

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复原力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孟加拉国气候问题先锋、谢赫·哈西娜总理的领导下，孟加拉国正努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工作，制订了碳预算、制造程式脱碳以及低碳工业化的具体计划。考虑到气候变化和灾害带来的多方面弱势，我国政府最近通过了《三角洲计划2100》，以此指导我国下一个百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孟加拉国承诺，落实其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框架内做出的国内自主贡献。我们已将气候行动和灾害管理纳入国家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流。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为了确保我们人民的粮食安全，我们一直在投资于改造我们的农业，使其更能抗御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影响。我们采取了各种举措来增加造林，包括一个价值5000万美元的项目，用于保护孙德尔本斯，世界上最大的红树林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在地。

尽管有众多挑战，但在国家一级，孟加拉国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例如改进我们的预警系统、传播信息、建立飓风避难所和积极配合专门的气旋备灾方案志愿人员开展备灾和应对活动，最近得以减少自然灾害事件中的人员伤亡。

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正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文字和精神。最近通过的《安全、

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也承认，投资于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加快这方面的全球合作，将有助于消除迫使人们离开来源国的不利驱动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为可持续发展而加倍努力。孟加拉国坚信，必须在国际发展合作的模式中讨论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大排放者必须争取快速减少温室气体。此外，向脆弱国家的适应努力提供财政资源和确保转让技术将是对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构成的威胁的最有效回应。

虽然我们强调有效执行《巴黎协定》和其他相关的全球文件和机制是对抗气候变化影响之必要，但我们并没有忽视气候变化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会存在联系的事实。整个联合国系统应该共同努力，提高我们的知识和理解，以确定气候变化是否对特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任何直接威胁，或者它是否是其中一个倍增因素。整个联合国系统还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以防止或解决任何显然是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后果的危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非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穆罕默德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贵国代表团就一个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主题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我还要感谢所有的通报人富有见地的介绍。

气候变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全球挑战之一。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能被视为免受其破坏性后果的影响，它们不仅破坏了发展成果，而且威胁到我们社区的生存。这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应对。虽然在一些领域内，对于气候变化和冲突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尚有争论，但毫无疑问，正如我前面的许多发言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为冲突创造条件，或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威胁倍增器。这些条件可能成为困难情况下的临界点，也可能压缩解决问题的选择范围。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的情况明显体现了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的复杂关系，那里的贫困社区严重依赖于日益萎缩的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在此背景下，请允许我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尽管发展中国家对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迅速恶化负有的责任要小得多，但它们蒙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例如，非洲对温室气体的贡献微小，但我们的大陆仍然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脆弱的地区之一，这危及《2063年议程：我们所希望的非洲》所概述的发展愿望的实现。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并将要直面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的风险，包括闷热、强降雨和强风暴。其他国家已经并将继续面临更具挑战性条件的风险，诸如粮食和农业、水、卫生、渔业、基础设施、交通和其他生计来源。气候变化也是造成移民增加，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移民增加的部分原因。

第二，如果我们要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冲突和安全风险，会员国别无选择，只能充分履行各自在旨在解决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各框架中所作的各项承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采取具体措施，按照《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履行这些义务和承诺，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和持续的气候融资。及时为缓解和适应提供明确的执行手段以及促进适当技术的转让，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将补充国家和区域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防止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安全威胁和冲突。

第三，非洲联盟对气候变化的反应通过其对国际环境制度及其自身环境框架的持续承诺得以体现。《巴黎协定》缔结三年后，非洲继续巩固其努力，特别注重伙伴关系，以确保非洲国家能够通过执行其国家自主贡献，谋求低碳和有气候韧性的发展道路。让我借此机会重申非洲对《巴黎协定》的坚定承诺，该协定为解决这一全球威胁提供了雄心勃勃的框架。

最近，在2018年1月30日通过的关于西非和萨赫勒的主席声明S/PRST/2018/3的基础上—声明承认气候变化与暴力之间的联系--，非洲联盟（非盟）将2018年5月21日举行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774次会议作为关于气候变化和非洲冲突之间联系的公开会议，并讨论对安全的影响。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还强调了气候变化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并注意到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能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指出了协调努力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重要性，并向成员国和非盟伙伴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特别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需要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发展应对机制和增强抵御能力；第二，需要在国家和大陆层面制定体制框架，积极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冲突的安全影响；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需要加强预警机制，以防止与气候有关的冲突。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要立足于多边方式--《巴黎协定》仍然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否则就不会是真诚的。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非洲联盟将继续推进多边合作，并与其伙伴建设性地合作，以解决气候变化及相关的安全威胁和冲突的根源和负面影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瓜多尔代表发言。

加列戈斯·奇里沃加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首次在安全理事会拥有一席并在本月主持安理会。 召开本次关于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辩论会的举措，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的出席表明，将这一根本问题提请会员国注意是主席国的优先事项。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其不利影响破坏了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气候变化的影响既真实又突如其来，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严重。鉴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国际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拥有通过谈判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策所需专门知识的主要的政府间论坛。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并根据联合国各机构各自的职责调动其能力，可对全球努力形成补充。

由于全球变暖、荒漠化和干旱、海平面上升以及其它自然灾害，家园和基础设施被毁，农作物绝收，粮食缺乏保障，失业和不平等现象加剧。从环境、经济和社会受到的影响可以看出，付出巨大努力才收获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人道主义后果是灾难性的——数百万人丧生，人们流离失所，家庭离散，遭受剥削，并被边缘化。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必须每天长途跋涉寻找水和食物，导致受教育和工作机会受损，而且青年有被暴力极端主义招募的风险。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冲突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日增，应紧急采取创新性办法。在这方面，2017年有1.357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需要资金235亿美元。在这一背景下，厄瓜多尔提倡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发展权。我们主张，除了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外，还应更多地提供适足、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

有必要推广各种预防性办法，以全面的方式应对灾害风险，制定旨在防范多重风险、便于查阅、以人为本的跨部门的包容性政策。这一点在《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得到了确认，因为易受灾害影响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得到特别关注，原因是它们更为脆弱，面临的风险更大——这些风险往往超出这些国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

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就会面临危险。我们希望，本次辩论会将促使人们在相关论坛上拿出政治意愿并调动资源来应对气候变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发言。

阿马约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并祝贺它担任1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也谨祝贺安全理事会另外四个新当选的非常任成员——比利时、德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首先，我表示，我们将在它们执行其所面临的崇高任务的过程中给予支持。

主席先生，我也不应忘记感谢你就这一重要议题召开本次会议，并分发指导本次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19/1，附件)。我还借此机会感谢各位通报人今天上午就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的联系以及相关的不安全问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发言。

肯尼亚非常重视有效管理气候所致灾害，此类灾害依然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大威胁。今天各位通报人和发言者就气候变化问题所作的发言和分享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仍然面临干旱、飓风、海啸、洪水和极端气温等生存风险。这些风险往往使投资付诸东流，破坏生计，引发冲突，并导致贫困蔓延。

贫困率高、适应能力不足的地区非常容易受到极端天气及其它突发气候事件的影响，即使是面对稍微极端一点的气候事件，也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承受的风险最大。与气候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和洪水，在非洲许多地区频频发生，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构成主要威胁。例如，在非洲之角，持续的干旱除了导致与水和牧场有关的冲突外，还经常造成粮食不安全，更不用说普遍的经济不稳定。

我国代表团认为，通过加强全球合作与协作，我们能够适应并增强我们抵御继续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气候相关灾害的能力。我们也许无法改变气候相关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频率或规模，但我们至少可以在灾害发生时做好准备、预先制定计划并尽量减轻其影响。

许多与气候有关的国际框架，如《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有效抗击灾害，培养抵御灾害的能力，特别是在我们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中培养这种能力。然而，主要挑战仍然是调动执行手段，特别是在地方一级。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缺乏适当的技术和其它能力，将国际指导准则全部本国化成为一项重大挑战。

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通过增加投资以及加强负责防备和管理灾害的相关国家机构，缩小执行差距。肯尼亚在根据有关基准评估灾害风险管理最佳做法后，于2018年更新了本国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该政策制定了各种战略，确保政府致力于加强灾害研究和制定减少风险战略。这项政策主要以一个有效的预警、信息和预测系统为依据，将灾害管理纳入发展规划和强有力的体制框架的主流，特别是在基层一级，以便对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调。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全球层面重申我们的承诺，重振旨在减少灾害和风险的国际合作与协作，特别是在与气候有关的信息收集、预警、研究和发展等关键领域。因此，调集充足和可预测的财政资源、转让技术以及建设能力也将使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避免许多冲突和相关的安全威胁。

最后，我重申，肯尼亚支持做出多边努力，应对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优先重视并呼吁更加雄心勃勃地采取气候行动。我期待计划于9月举行的气候峰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发言。

米格尔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祝贺我们加勒比大家庭的成员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举行这一重要讨论。

我们谨赞同巴巴多斯代表以加勒比共同体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伯利兹代表将以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同时也认识到我们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来遏制气候变化。这两个想法并不相互排斥。整个经济领域都迫切需要碳减排，这让气候变化成为一个无可辩驳的政治问题，它的影响也使其成为一项关乎存亡的最优先事务，同时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我们海岸线受到的侵袭，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负有更多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不需要负责的国家受害最深，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萨赫勒地区国家。实际上，未能制定和履行雄心勃勃的减排承诺的主要排放国正在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采取直接敌对行动，我们应该抵抗它们有害于我们利益的鲁莽之举。一方面是诸如此类的渎职懈怠，另一方面是小岛屿国家今后因天气事件日益频繁和严重而面临人员死亡和破坏，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得出直接因果关系。

气候威胁是独特、空前、紧迫的。因此，它往往很难应对。但这不是掩饰问题的理由。气候变化加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威胁，但它尚未取代全球武装冲突的持续危险。叙利亚、也门和缅甸的人类苦难需要更多的国际关注和行动。同样，对朝鲜半岛、海湾国家和巴勒斯坦国内的紧张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需要采取持续、优先的外交手段。此外，在我们处理非洲大陆纷繁复杂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必须纠正历史上非洲受到的不公。然而，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错误地让人在这些问题之间作选择。我们必须应对所有这些问题，不论气候安全有多难实现。

我们在本机构大声疾呼，呼吁碳排放国大幅削减碳排放，以阻止气候变化进程，我们也赞同一些国家呼吁让安全理事会更加清楚并敏锐了解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可怕后果。如果我们首先认识到气候是一种安全威胁，然后团结一致努力保护所有人免受其害，那么我们就走上了正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很荣幸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进行原则性分析并加以解决，还为此搭建桥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弗林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今天关于这个重要紧迫议题的辩论会，爱尔兰也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会议厅必须听取和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它影响全球，我们的安全面临风险。必须停止否认气候变化。必须停止否认气候变化与安理会任务授权之间的关联。

显而易见，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一致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虽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重要举措，但突出的现实是，气候灾害是一个重大威胁，并将继续发生，安全理事会必须应对它们的影响。我们知道，气候灾害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这可能会破坏粮食和用水安全，增加性别不平等，并损害生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气候变化、冲突和流离失所之间具有联系。简而言之，气候变化使威胁倍增。

虽然气候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因区域和国家而异，但采取全球应对措施是我们应对这个威胁的唯一途径。我们认为，对于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所有具体国家局势，都应该考虑气候和安全关切。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在和平与发展关系方面的行动评估气候变化风险。

我们必须努力确定应对气候安全威胁的最佳做法。成功因素可以复制，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这样做，例如让安全理事会设法从讨论气候变化风险转为实际行动。这包括更系统地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合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挑战。

国际社会还应开展循证分析，借此更好地了解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些联系的复杂性，理解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变化、如何消除风险，就必须听取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证词。基于人权的气候政策和国际应对措施十分重要。脆弱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需要在这里得到倾听，我们赞成考虑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这张讨论桌边的代表性。

承认妇女是能够带来变革的资源也很重要。妇女是最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但也拥有提出和引领解决方案的独特能力。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关于青年作用的慷慨陈词。我们要多听一听那些很少受邀来到这张讨论桌边的人发言。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任命一名负责气候与安全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是我们为推进该领域工作而可采取的另一个具体措施。这个星球和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有赖于我们挺身面对现实，面对我们每天在气候变化中看到的威胁倍增因素。我们的和平、平等和发展都取决于此。但如果我们不能处理世界上气候灾害的影响，我们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安全。

主席先生，你可以依靠爱尔兰的帮助，我们有望作为2021-2022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为该议程努力开展工作，并且满怀壮志。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斯科克尼奇·塔皮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谨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和召开这次重要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讨论气候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赞扬并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出席本次辩论会。我们还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先生、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以及科学家帕维尔·卡巴特先生和林赛·格彻尔女士的通报。

这次辩论会无比及时，因为它在国际社会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工作方案之后举行，该方案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一部分，于12月16日在卡托维兹确定了执行《巴黎协定》的规则和准则。然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1月的报告描述了新的挑战，并警告我们，要实现将全球升温限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的目标，就需要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并制定广泛而深入的适应政策。环境变化比我们理解和保护环境的努力速度更快。警钟仍在鸣响;犹豫不决的时候结束了。气候变化的威胁将决定本世纪和未来世纪，需要作出深刻的多边努力。这是一个严重、紧迫、不断增长的威胁，我们不能继续忽视或淡化它。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提高我们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的安全影响的认识，并制定评估和减轻此类灾害风险的战略。因此，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发展分析技能，使我们能够迅速评估国际安全可能受到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威胁，同时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有关这些威胁的有用信息，并帮助各国制定和实施妥善应对这些威胁的行动计划。

在这一方面，我国通过智利国际合作发展署建立了创新的合作机制，以在区域一级建设减少灾害风险的能力。我们强调通过与日本政府合作的“纽带项目”所取得的成功，该项目旨在培训数千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专业人员，以管理紧急情况和灾难。

我们欢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倡议主办将于9月23日举行的2019年气候峰会。在这一方面，我谨宣布，智利政府坚定、果断地致力于在全球合作努力解决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我国将于2020年1月主办并主持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五届缔约方大会）。这确实让我们倍感自豪，但同时也是对我国提出的巨大挑战，迫使我们努力工作，以确保这一重要会议获得成功，使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我们正在根据智利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发挥这一作用，特别是坚信

气候变化是一项必须由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执行的集体任务。

最后，我们坚信第二十五届缔约方大会应该是推动更大气候行动的努力中的里程碑。重要的是，各国应借此机会宣布采取具体步骤，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壮志。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瑙鲁代表发言。

摩西女士（瑙鲁）（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在联合国有席位的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并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通过将气候变化问题直接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展示了这种值得称道的领导作用。十年前，很少有国家想要讨论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但现在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曾经可以管控的挑战已成为一场改变世界的危机。

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于2018年在瑙鲁举行了主题为“建设强大的太平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岛，我们的意愿”的会议，并于9月通过了《Boe区域安全问题宣言》。太平洋地区知道，它在合作时更强大。太平洋地区已经显示出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造成的影响的集体领导能力。《宣言》重申，气候变化仍然是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生计、安全和福祉所面临的单一最大威胁。《宣言》还确认扩大的安全概念，即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及环境安全构成多方面挑战。

我们已经在我们各国和各社区看到了危险的影响，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承受着最大负担。据科学家称，气候变化导致了许多最近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而这些事件摧毁了世界各地的社区。尽管有《巴黎协定》，但气候变化并未消失。我们在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气候恢复正常。事实上，即使我们实现了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但情况也会继续恶化。从我们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影响所需要的机构尚未到位。部分原因是，我们对人类系统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气候影响知之甚少。

为了实现联合国宗旨，我们必须认识到，各国不能单独解决这类问题。太平洋地区通过《Boe宣言》致力于共同努力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的能力。无论好坏，我们的命运现在通过一个往往使最贫困者处于非常危险境地的全球系统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国家应对工作很重要，但如此巨大的问题需要比当今更大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它还要求联合国在拥有相关授权的机构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我现在要重点谈一下粮食生产和分配，因为我们有一些最近的经验可借鉴。2007年和2008年的粮食危机在世界各国引发了社会动荡，并促使一些国家宣布紧急状态。我们的全球供应链经常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奇迹。然而，在粮食危机期间，全球供应链却无法以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向需要粮食的人们提供粮食。许多变数导致了粮食危机，但其中包括世界主要粮食产区的气候因素。科学家们预测，在更加温暖的世界中，农业产量将会急剧下降。因此，下一次粮食危机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并非仅是粮食系统。供水、国际运输、工业生产、金融和保险市场是复杂的人类系统，它们相互关联、遍布全球，并且通常非常脆弱。其中任何一个人类系统发生故障，可能比引发故障的气候影响更加危险。

我们认为，任命一位气候和安全问题特别代表是准备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问题的关键下一步骤。我应该指出，这不是一个新提议;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于2011年首次提出这一提议。这样一位秘书长特别代表将履行以下职能：使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充分了解新出现的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气候风险;促进在可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加强区域和跨界合作;监测气候安全关系中潜在的临界点;酌情参与预防性外交;以及当气候变化是一个可能破

坏稳定的风险因素时支持冲突后局势。特别代表也可以很好地协调联合国有关机构，包括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我们需要勇气来应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现实，不论这在政治上可能多么不方便。气候变化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安全挑战。这不仅要求遏制少数几个热点，还将经常要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高度融合和日益危险的世界，我们如何开展合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杜克·埃斯特拉达·迈耶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多米尼加就这样一个紧要的问题及时召开本次辩论会。本次公开辩论会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以便不仅阐明极为紧迫和复杂的气候相关问题，而且还阐明如何最妥善地在联合国主导下从体制上处理这一问题。

巴西深切同情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国家的境遇，尤其是同情位于灾害多发地区的民众，他们一次又一次面临这一不可逾越的任务：在每个飓风季节结束时或者当地震终于停止时重新开始。巴西确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特殊挑战，需要应对地震、洪水、泥石流及其他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对其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以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的影响。在自然灾害发生后进行多边人道主义协调，对于改善实地局势至关重要，不论是拯救生命、向有需要者提供即期救济，还是在以后阶段协助受灾国开展重建工作，都是如此。 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向受灾国家展现有难同当的精神，而且它不可能以任何不同的方式行事。例子有很多，且举其中一个：在八年多前海地发生毁灭性地震之后，在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服役的巴西蓝盔人员得以最先作出反应，向海地民众中的最弱势者发放清洁饮用水、食物和基本药物。巴西作为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及其后续会议“里约+20会议”的主办国，为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就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所作努力感到自豪。

我们的理解是，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作为《联合国宪章》规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机关的安全理事会的权限范围。将安全问题与环境议程挂钩可能会错误地假设，任何环境祸患，或者说自然灾害，都会自动导致社会动荡和武装冲突，最终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自然灾害与冲突爆发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具体情况各有不同。

这并不是说，当出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的具体特定局势时，安全理事会不应把气候因素考虑在内。如果一方面说自然灾害能够对安全环境产生影响，那么反过来说武装冲突可能对环境构成危险也是正确的。让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而不只是少数几个成员参与，对于提出必要的法律方案和建立必要的体制机制，以制定必要的风险管理战略和作出必要的协调努力，来帮助会员国、政府及其人民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应不遗余力地确保我们各国拥有应对自然灾害所需的法律框架和体制架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发言。

贝克莱斯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首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愿赞同巴巴多斯代表以加勒比共同体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伯利兹代表将以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名义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也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赞扬你展现领导风范，将这一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带到本会议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紧迫挑战中始终走在前列。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表明国际社会必须真正履行雄心勃勃的承诺，

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来处理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该现象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

过去几年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历过严酷的旱季、破纪录的降雨和洪水以及速度惊人的海岸侵蚀。这些经历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现实。在波兰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秘书长指出，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面临重大危机。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小组特别报告《全球变暖1.5°C》指出，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比以往预料的更为严重，并因此造成健康、生计、人民安全和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加剧。

然而，这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这个紧要关头，气候变化给经济、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深远后果可能会加剧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脆弱性。气候变化作为使威胁倍增的因素，使有限的资源更加吃紧，增加社会和经济压力，损害我们脆弱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这一切都会导致匮乏、民众流离失所和冲突。

因此，不可否认，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后果错综复杂、相互联系，需要采取横贯联合国系统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所有相关机制和机构的全面、综合办法予以应对。在这方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欣见，在乍得湖流域、西非、萨赫勒和索马里等若干具体情况中，安全理事会确认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同时还强调必须改进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评估，以便更有效地预测潜在冲突。

尽管如此，仍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相关安全威胁和气候相关灾害安全影响的认识，以使安全理事会更好地了解这些威胁，尤其是在那些最易受到影响的区域，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安理会和平与安全机制的机构知识与广大联合国系统机构知识之间的协调利用具有可观的潜力，在各国和联合国系统之间形成协同效应，从而通过早期行动，有效增强复原力，调查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和平威胁。

最后，但也许是最根本的是，要确定安全理事会在此问题上的长期作用及其参与。我国代表团完全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是协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的主要论坛，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增进对气候方面安全风险及如何在安全理事会内处理这些风险的了解，不应也不会与大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责任重叠，反而可加强对联合国及其机构协调应对的力度，以便它们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

最后，主席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会议有助于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的关注。对于身处这一生存威胁前沿的我国而言，现在是采取雄心勃勃和真诚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风险的时候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越南代表发言。

邓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越南高度赞赏多米尼加共和国倡议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这一重要议题。我们还感谢各位通报人提供的翔实通报。

气候变化的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期，超出我们能够调整和适应的速度。气候相关的极端天气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逐年递增。灾难性热带风暴、强降水、洪水和干旱给数亿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因此，人口流离失所、移徙和粮食及供水无保障构成潜在安全风险，有时甚至导致实际冲突。气候变化影响威胁最大的是海平面上升。研究表明，即使在最乐观的情景下，到2050年，国际社会若不采取具体的气候和发展行动，数百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受到影响。小岛屿国家面临生存危险。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影响已变得更加明显。威胁已经到来，如何应对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过去二十年，越南是受气候风险影响最严重的10个国家之一；在过去四年，我国已经成为受影响

最严重的前六个国家之一。让我仅谈其中一点，即海平面上升。有项研究表明，如果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约1米，湄公河三角洲近40％将被淹。海水倒灌已经导致三角洲大片地区土壤盐渍化问题日益严重。这不仅将影响越南该地区近2 000万人的生计，而且将影响越南以外地区的粮食安全，因为我国是世界三大稻米出口国之一，而我国大米出口90％来自湄公河三角洲。

越南支持全面应对气候变化，包括解决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近年来安全理事会愈益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继续注重该问题。我们强调联合国系统、包括安全理事会和许多区域组织的重要作用。它们的作用至关重要，以确保在其工作与合作中纳入安全层面，以支持国家和区域的努力。在东南亚，根据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同一个东盟，同一种应对：东盟一体应对区域内外灾害宣言》的精神，由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负责促进10个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备灾及应灾合作与协调。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国际伙伴与我们密切合作，提供协助。

我们也鼓励加强与各位代表和专家、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进行更多信息交流，以及更统筹分享数据和专长。

我们支持制定全面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处理气候变化所涉所有各方面问题，包括安全影响，调动所有联合国组织总部、区域和国家各级的积极参与，与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指望安全理事会继续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比卜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

气候相关灾害的发生频率、范围、速度和严重程度令人深为关切。灾害危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差异极大。

根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的最新出版物之一，过去20年，最贫穷国家的人因这类灾害而死亡的可能性是最富裕国家的人七倍以上，而受伤的可能性则是后者的六倍多。仅此即证明，我们努力的目标必须是减少受灾地区的伤亡人数。

我们还应该积极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减少气候相关灾害。这种努力当然必须基于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提供相关技术。

同样，我们应该促进相关的多边文书和多边机构。在这方面，必须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包括退出相关国际文书的企图。我们还强调，必须通过能力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易受这种灾害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权能。这意味着分享最佳做法，交流经验，无条件、非歧视性转让财政资源及气候友好型专门知识和技术。

那将使这些国家不仅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而且做好准备，以便在灾害发生时挽救更多的生命。此外，那也将扫除气候变化带来的障碍，帮助这些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地区即如此，沙尘暴威胁地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毋庸置疑，还应当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作为对能力建设努力的补充。

如果这些是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就应该在相关论坛，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此类机构中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安理会没有处理该问题的法定职权或技术能力。在2007年以来举行的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无论是安理会成员，还是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均未就该问题是否属于安理会职权范围达成共识。相反，许多国家认为，这是安理会侵犯联合国其他机关权力和职能的实例。安理会在尚无法完全解决某些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执意介入未被证明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令人费解。我们认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关切，并强

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与气候有关的问题超出了安理会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只能通过能力建设以及财政和技术援助来解决。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敦促安理会专注于其核心职责，避免作出自己最终无法兑现的解决问题的承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马尔祖克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与你一起参加本次关于应对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公开辩论会，让我感到荣幸。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关切，我赞扬多米尼加共和国召开本次辩论会。

我们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联合国系统中讨论此类问题的最佳论坛。然而，我们对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感到关切，并认为，鉴于应对这些威胁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在各级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此类对联合国构成挑战的灾害和威胁。

我们认为，气候变化会对联合国的三大支柱造成不利影响。地球表面日益升高的温度对我们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和具体的威胁，并将加剧其它威胁和潜在的灾难。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某些区域，这些威胁更加复杂，因为它们阻碍我们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降雨不足以及对水资源不可持续的利用导致缺水，并导致进一步不可持续地使用其它资源，从而增加了移民和流离失所的可能性。每个人都知道造成以死亡为结局的移民的原因。

在缺乏有效的公平合理用水公约或区域框架的情况下，有关方面过度使用和控制共同水资源的做法导致我国的大河承受压力。国际法维护此类水资源共享国权利的规定未得到尊重。

阿拉伯海伊拉克三角洲环境恶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其它水资源特别是淡水资源的减少，这个生物多样性丰富、棕榈树密布的生态淡水系统变成了海水系统。我们还要指出，恐怖主义对民用和供水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此外，不稳定和脆弱的社会经济因素导致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蔓延。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制定适应措施，作为我们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办法的一部分。

我们赞扬国际社会向伊拉克提供支持，帮助我们铲除境内的恐怖主义。同时，我们呼吁尊重我国的水权、特别是我国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权，为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贡献。

最后，我要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受政治边界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基于国际法和外交倡议的包容性区域办法，解决水资源共有国之间的问题。此类办法将有助于我们消除气候引发的任何紧张局势和威胁，铲除恐怖主义，加快基础设施的重建，提高适应能力，并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准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海拉尔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正在对许多国家未来产生严重影响的需及时处理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如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

> “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我们面临着直接的生存威胁。”

事实上，在许多区域，气候变化正在损害各种至关重要的系统，如水、粮食和健康等方面的安全，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气候相关灾害也对冲突造成影响，破坏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严重依赖农业或旅游业等特定行业的国家。此外，海平面上升等缓慢发生的事件危及太平洋和印度洋某些国家的生存。各种风暴正在影响着这些岛国，土地遭侵蚀，再加上海洋酸化，它们的农业、渔业和旅游业遭到破坏，谋生手段受损。因此，这些岛国很可能在被大海吞没之前就已沦为非宜居之地。因此，

必须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粮食安全，而且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人口和政治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不安全以及冲突的威胁。同样，必须投入更多资金，使各社区能够更好地增强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这方面，迫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减少并减轻自然灾害的潜在后果。应呼吁私营部门做出更多努力，参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以减少需求，并通过计划中的筹资机制调动额外资源。

摩洛哥王国很早就意识到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包括它使威胁倍增的情况，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政策来应对这些威胁。这一承诺的具体体现是，通过了若干部门战略。这些战略将维护公民福祉和增强妇女权能置于其执行工作的核心，并根据国际标准促进环境、经济和社会三方面之间的平衡。

在2016年11月于马拉喀什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会议期间举行的非洲行动首脑会议使非洲领导人有机会协调和统一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为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气候挑战寻找更好的办法。那次首脑会议促成了若干倡议，即，在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的倡议下，设立了气候委员会和刚果盆地蓝色基金。

会议期间，还发起了“非洲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倡议”。该倡议旨在解决因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而加剧的不稳定的根源。我国打算通过这项倡议，在带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执行非洲联盟赋予的在非盟委员会范围内协调移民方案的任务。此外，在马拉喀什会议期间，还发起了“非洲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倡议”。27个非洲国家采纳了这个倡议，并建立了一个旨在使非洲农业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的真正的联盟。

供水及其适当管理也是摩洛哥的两大优先事项。全世界，特别是非洲区域，正面临缺水问题。摩洛哥王国继续对大型现代灌溉项目进行投资，并在最脆弱地区建立饮用水供应方案。在立法层面，通过了一项新的水资源法律，确立了全面、参与性和权力下放的水资源管理规则，使人们能够在预期和确保水资源安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干旱时期。

摩洛哥的目标是，到2030年，不仅在马格里布，而且在非洲和欧洲-地中海区域，成为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的主要供应者之一。摩洛哥虽然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但正在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将该国气候方面支出的64%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这相当于总投资支出的9%。

在这方面，摩洛哥第一个太阳能项目，即位于瓦尔扎扎特的诺尔发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综合体，总发电量为580兆瓦。诺尔发电站占地3000多公顷，由四座多技术太阳能发电厂组成。它的开发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并附设一个面积150多公顷的研究和开发平台。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代表发言。

贝穆德斯·阿尔瓦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成功地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提出1月份的实质性议程。我们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的宝贵通报。

乌拉圭认为，现在应该重申，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今天和最近的未来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也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是乌拉圭的高度优先事项。我国的经济，包括其出口部门，高度依赖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又受到气候波动以及日益严重和破坏性天气现象的影响。

过去十年来，乌拉圭在通过经济和环境政策寻求能源独立方面致力于可再生能源，这是乌拉圭致力于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例子。同样，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我们拉丁美洲区域的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虽然我们认为本次公开辩论会有助于讨论我们星球上未来生活的一个优先议题，但我国认为，为了避免将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对具体相关议题的讨论应限于相应的决定领域，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大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主要多边文书，《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呼吁各方捍卫该协定并加快执行。除其它外，我们必须继续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以及《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开展工作，并履行我们的承诺。

尽管如此，安全理事会定期审议气候变化与冲突、贫穷和不发达的破坏性影响加剧这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确实做得很好。作为2016年至2017年期间安全理事会访问萨赫勒、乍得湖流域各国、索马里和海地的若干代表团的参与者，通过实地访问以及与当局和社区成员的交谈，我们得以看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常常如何加剧了紧张局势。

乌拉圭深信，联合国各机构、方案和专门机构之间的充分和灵活合作对于应对影响冲突的气候退化进程至关重要，首先要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最近表示，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以协调和共同的方式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就无法应对笼罩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这一真实威胁。子孙后代有权居住在一个安全的、适合可持续发展的星球上。

最后，我们要强调将于9月份举行的气候问题首脑会议的重要性，它是加强已经作出的承诺并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加紧共同努力的一种方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发言。

马尔迪尼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召开这次重要的讨论会。我将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分享我们从实地的角度对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双重影响的看法。我还要谈一谈国际人道主义法如何保护环境。

气候冲击和武装冲突的双重影响损害了人们的应对能力。气候变化加剧了脆弱性和不平等，特别是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国家、社区和民众对保护自己和适应的准备最少，能力最差。冲突损害了促进适应气候变化所必需的结构和制度。

上周，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结束了对萨赫勒地区为期8天的访问。在该地区，武装冲突、贫穷加剧、公共服务被削弱、以及传统生存手段受破坏不仅是冲突造成的，而且也是可用土地减少和水资源不可预测造成的。正如我们在其它地区的行动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亲眼看到，面临这些双重挑战的社区所受到的影响不成比例。它们往往面临越来越大的洪水或干旱风险，被迫寻找新的生计，改变生活方式或离开家园。

我们还知道，在武装冲突中，自然环境或民用基础设施往往受到损害或破坏，这反过来又会产生可能导致气候变化的环境后果。虽然国际人道主义法没有明文涉及气候变化问题，但其中确实载有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则。例如，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了对重要自然资源的保护，开采这些资源可能会对气候风险产生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还保护某些自然资源，如饮用水或农业区，这些资源是平民生存必不可少的。

在讨论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如何会增加人们在武装冲突局势中的脆弱性。事实上，我们自己的运动在人道主义反应方面必须对这一日益严重的挑战具有敏感度，并让当地行动者参与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灾害的努力。今年，我们将在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气候中心的支持下，在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内召开一系列气候圆桌会议，以期解决这些问题。此外，红十字委员会法律司今年将修订1994年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时期保护环境的军事手册和指示准则。我们期待继续就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与会员国和联合国进行对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努尔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友好的贵国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我也感谢各位通报者今天上午所作的宝贵通报。

我国代表团赞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法蒂玛·穆罕默德大使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

在当今世界，武装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并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唯一重大威胁。清单现在包括气候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威胁，这些威胁是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又一驱动因素，从而导致生活条件、人的安全状况恶化，政府满足其公民基本需求的能力削弱，特别是在同时涉及其它经济、社会、人口及政治挑战的情形中。我们注意到，易受资源匮乏影响的社会和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苏丹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冲突爆发，也使各种冲突更形复杂，难以解决，包括2003年开始的达尔富尔冲突。这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导致干旱、荒漠化和缺水的气候变化。达尔富尔人口的主要经济活动一直是放牧和农业。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因彼此争夺稀缺资源而陷入紧张，由于整个非洲沿海地区的干旱和荒漠化，这些资源日趋减少。人口增长、武器扩散以及由于邻国的冲突而易于获取这些武器，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局面雪上加霜。

在国家层面，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苏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加紧在全国实现和平的努力，因为和平是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及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基本步骤。除了增加水力发电量和寻求其它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之外，我们还努力在我国全境取得发展，同时通过非洲绿色长城倡议大力植树造林，该倡议包括若干非洲国家，从西部的塞内加尔到东部的吉布提。

为了在应对气候相关威胁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说明如何在不同行为体之间开展合作，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预防外交，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以防其导致冲突，同时促进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及其相关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在气候变化方面开展合作。必须加紧努力，落实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工作中，将由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召开的2019年9月气候峰会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其次，必须更加重视预警系统，特别是与气候相关的冲突。

第三，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从而增强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其更有能力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

第四，必须加紧努力实现和平，特别是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同时更加关注冲突后的国家。

第五，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气候变化，适应环境变化，同时受益于这方面的技术进步。

第六，我们必须促进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在气候问题和冲突方面的合作，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在区域层面造成的安全威胁。

最后，我们必须让维和特派团、政治特派团和联合国区域办事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拿出解决办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芬兰代表发言。

绍尔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提请我们注意这个议题。我们也感谢通报者的发言。

气候变化和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真切存在。气候变化影响到粮食和水的安全保障，使涉及冲突和被迫移民的风险倍增。我们必须综合施策，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并加强预警、备灾和及早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北极理事会现任主席国，芬兰将气候变化及其对北极地区的影响视为一个优先问题。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气候小组）最近敲响的警钟明确无误。气温平均上升仅1.5° C仍有危险，上升2° C就会带来灭顶之灾。在回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报告的调查结果时，我谨通报安理会，今天上午在赫尔辛基，五个北欧国家 -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的总理签署了一项共同努力实现碳中性的宣言。

为自然资源（如水）而起的冲突往往是武装冲突的根源。从冲突预防和调解的角度来看，包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妇女往往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中首当其冲，而妇女对和平解决方案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让年轻人参与同样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了年轻人在气候方面起带头作用的令人鼓舞的例子，我们应该更多地给予支持。

与气候有关的灾害造成巨大的人类痛苦和经济损失。虽然加强减灾仍然是减少未来风险的最重要方式，但我们今天也必须更多地应对风暴、洪水和干旱。正如本次会议早些时候的通报所证明的那样，世界气象组织提升了该组织的全球影响力。芬兰赞扬世界气象组织在寻找气候挑战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参与秘书长的预防冲突努力。芬兰强调了水文气象合作的重要性，并促进了世界气象组织与全球各国气象机构之间的合作。我们在气象领域的发展援助是世界第二高的。提高播报高质量天气和气候信息的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应对更高的气候相关风险。

总之，未来减少气候相关风险的最重要方法是加强减缓。如果要真正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我们必须提振我们的雄心壮志。我们期待9月份秘书长的气候峰会，这将是我们展示我们将全球升温保持在1.5℃以下决心的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发言。

纳济罗夫先生（乌兹别克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鉴于当代世界在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各种严峻挑战，从乌兹别克斯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及时的事件。

今天，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咸海的枯竭，这给该区域各国政府和社区带来了一连串的环境、社会经济、健康和人道主义挑战。阿姆河和锡尔河流量减少了五倍，使咸海的水量在过去的50年里减少了14倍以上。盐度水平增加了25倍，现在大大超过了世界海洋。今天，取代曾经繁荣的渔业水域的是超过550万公顷的沙盐荒漠，这是沙尘和盐沙风暴的滋生地，每年携带超过7500万吨的灰尘和有毒矿物质在大气中跨越数千公里。

咸海灾难使该地区的气候条件恶化，夏季增加干燥和炎热，冬季延长了寒冷期。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至2050年，该地区的气温相对于当前指数可能再增加1.5° C至3° C。此外，全世界都观察到咸海灾难的威胁性影响。据国际专家称，来自咸海地区的有毒盐出现在南极洲的海岸、格陵兰岛的冰川、挪威的森林和全球其他许多地方。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沙夫卡特·米尔齐约耶夫先生在大会2017年纽约第七十二届会议期间的发言（见A/72/PV.5）引起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对咸海危机的特别关注，并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协同努力。

在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会创始国首脑会议期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强调了团结努力克服咸海灾难后果的重要性。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包括将咸海地区划为生态创新和技术区域。该倡议旨在整合中亚各国的努力，创造条件吸引外国投资开发和引进生态清洁技术，确保广泛开展绿色经济，防止进一步荒漠化，发展生态旅游和实施其他措施。

与此同时，应该承认，国际金融组织和捐助国在咸海地区的资金水平和活动协调不足，限制了中亚国家有效解决这一生态问题的努力。这种情况促使乌兹别克斯坦和联合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平台，以减轻咸海危机的后果，并确保咸海地区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2018年11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建立了“咸海区域人的安全多伙伴信托基金”。它由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主持，他于2017年6月亲自访问了咸海，并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为环境灾害之一。信托基金是变革性的，以证据和人权为基础，其目标包容促进和加强多部门和以人为本的应对措施，以处理其后果。考虑到咸海灾难的全球性，有必要通过实施深思熟虑、有针对性和资金充足的项目，扩大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联合行动。

最后，我要强调，设立上述信托基金应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国重新审视咸海问题，并协同努力解决这一全球问题。就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而言，它随时准备与它们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以减轻我们时代这一尖锐生态问题的后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发言。

任加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赞扬多米尼加共和国就这一重要问题组织本次会议。

罗马尼亚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气候变化不是冲突或破坏和平的直接原因。它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起作用。气候变化以自己的方式体现行将到来的危机，其缓慢的进展往往不被我们注意，但可能与公开冲突一样危险。在萨赫勒地区、中亚、中东、加勒比地区或太平洋岛屿，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引起巨大关注。有时它甚至是一个生存问题，就像面对因温度升高而被淹没风险为生存而奋斗的小岛屿国家的情况一样。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流离失所人口的数量、粮食不安全、缺水、干旱和海平面上升。通过在邻国之间制造政治和外交紧张局势，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人口的大批流离失所，这也可能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根据世界银行的最近一份报告，预计到2050年将有1.4亿人流离失所，因为他们寻求避免气候灾难的影响。

如《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强调的那样，气候变化现已成为联合国的优先事项。罗马尼亚充分致力于执行这些基础性文件。2018年12月，我国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4次会议，并签署了《关于通过森林改善气候的卡托维兹部长级宣言》和《西里西亚团结与公正过渡宣言》。

在参加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及其后续特派团期间，我们目睹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的演变过程，这场危机实际上是气候造成的安全风险。罗马尼亚还在毁灭性飓风“艾尔玛”和“玛利亚”过后，向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提供财政支持，与加勒比区域的友邦站在一起。

世界各地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表明，气候引发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常见，必须在安全、经济、政治、军事和环境等方面采取综合对策。罗马尼亚对萨赫勒区域不安全局势的多层面根源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担任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会）主席期间，我国倡议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努力，并提议2018年11月13日建和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

会议将“气候变化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所面临挑战之间的联系，尤其关注萨赫勒”作为主题。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建和会的所有成员当时以协商一致方式接受了我们的提议。那次会议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对萨赫勒稳定的不利影响，该区域在建设和平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在加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方面进行统筹、合作与协调的必要性。

罗马尼亚高度重视国际合作。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是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威胁的适当框架。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参与了“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作为我们以包容方式维护、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承诺的一部分。此外，我们视预防和建设复原力为具体的解决办法。

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上个月在联合国总部这里组织了一次会外活动，讨论了加强防备自然灾害能力问题。在那次会议上，罗马尼亚紧急情况办公室主任介绍了我国在使各机构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方面积累的经验，并分享了保护平民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最近与欧洲联盟和其它七个国家一道在罗马尼亚境内开展的涉及广泛国际合作的演习。

最后，气候变化不仅加剧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而且本身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更好地评估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之间的联系，并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区域提供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卡塔尔代表发言。

阿勒萨尼女士（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们谨赞扬你本月明智地管理安理会事务，并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还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世界气象组织首席科学家以及史汀生中心环境安全项目研究助理作了有价值的通报。

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和关切正在加剧，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和有效地加以应对。这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此刻就在影响着我们的星球。这个星球正在遭受这个现象造成的长期和即时的影响。许多地区遭受的影响令人震惊，其中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粮食和水安全受到威胁；疾病流行；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自然资源匮乏，导致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加剧，紧张局势升级；干旱、洪水以及农业和渔业等传统生计的丧失导致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

脆弱的区域和社区，特别是小岛屿国家和干旱区域，受到上述危险和不利影响的威胁最为严重。然而，没有一个区域、包括我国所在区域——这是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干旱的区域之一——能免遭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尤其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因此，我们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在国际一级加快做出应对气候威胁的集体努力，有系统地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根据所有相关论坛和国际机构的专长和职责，使这一问题成为其优先处理事项。

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不仅如此，气候与和平及安全之间也存在联系。安全理事会在审议某些区域问题、特别是非洲问题时越来越注意到这种联系，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1/15已指出这一点。有必要更好地了解与气候有关的危险及其对冲突的影响。此外，还需要改进信息的收集和评估各种以及预警机制，以便有效应对这些威胁，预防冲突，维护和平。

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反映了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政治意愿。我们打算与国际社会一道，履行在《巴黎协定》中作出的承诺。卡塔尔国荣幸地主办了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会议。那次会议之后，各方达成了《巴黎协定》。我国主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8次会议，并加入了在2018年12月于波兰举行的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4次会议上就执行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的共识。

按照我国根据《巴黎协定》作出的承诺，卡塔尔投资管理局正为各种与气候有关的融资项目提供资金。我们是”一个星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创始成员，也是该基金的积极成员。该基金是2017年在巴黎举行的”一个星球”峰会上设立的，旨在加强全球资金分配，推动各国经济顺利地向更可持续的低碳经济过渡。

从卡塔尔国《2030年国家愿景》框架内的环境发展项目可以看出，我国重视环境保护。我们制定了保护环境和减少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的国家战略和计划。我们还在实施一些清洁能源和高效利用能源的国家项目，包括利用太阳能。到2030年，我国对太阳能的依赖度将占我们能源使用量的20%以上。我们正在努力使我国收入来源多样化，减轻对日益枯竭的能源的依赖度，以此来减少碳足迹。

最后，卡塔尔国强调，我们充分致力于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威胁和国际性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以确保今世后代的福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斯达黎加代表发言。

卡罗索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就这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重要议题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秘书长把气候变化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也是对我们生存的直接威胁。他告诫我们，“我们遇到了麻烦”。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生计丧失、粮食无保障、环境退化、边缘化和社会经济不安全以及其它影响，致使许多国家的整个人口脆弱无助和更容易患病，并且在其它地区造成贫困和/或流离失所，已一再被确认，气候变化与一些最紧迫的安全挑战密不可分。这些因素往往导致正在寻求获得日益有限的资源或控制地球上尚未受到监管或刚刚开始受到监管的部分地区的国家之间出现分歧、冲突甚至武装对抗。

哥斯达黎加处于极易受气候影响的地区。正如世界气象组织首席科学家今天上午告诉我们的那样，2017年的飓风“纳特”是哥斯达黎加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我们了解情况，并采取必要措施全面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

2017年，共和国总审计长发布了一份报告，透露哥斯达黎加在全球气候风险指数中从2015年位列第四十八下降至2017年位列第九十一，显示该地区情况急剧恶化。同样，在1998年至2010年期间，发生了320起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根据同一份报告，修复和重建受洪水、风暴和干旱影响的基础设施的年度费用同期从1483万美元增加到3.37亿美元。目前的自然灾害费用以每季度3%的速度增长，估计到2025年将达到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需要建立一个气候专项财政框架，以便有效地投资和分配资源，以缓解和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因为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不再是非频发性紧急情况，而是一再发生的现象。哥斯达黎加还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政策和计划，旨在落实我们的国家自主贡献，以及实施2018-2050年国家去碳化计划。该计划与我们的国家发展计划、投资计划及其它关键部门文书一起实施，包括10个去碳化项目，覆盖了从农业和运输部门到工业、废物管理和能源部门的整个经济。

事实上，世界上一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容易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和地球所有纬度都能感受到，并且那些处境更加脆弱和被边缘化的人和地区总是受影响最为严重。

同样，已显示妇女不成比例地承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她们被迫错过长期的教育和经济机会。因此，哥斯达黎加制定了一项名为“全民联盟”的战略。该战略旨在解决主要环境条约和协定中的性别问题，以跨领域方式优先考虑多边环境协定中的性别平等和人权问题。全民联盟已得到通过妇女署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的联合国的支持，并得到来自不同区域的许多国家的支持。

哥斯达黎加相信，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后果对每个人都将是毁灭性的。我们完全赞同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提醒我们，需要采取意义深远的行动来避免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这种行动还将为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明显的好处，并带来构建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社会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利用科学证据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以提升我们的风险评估、预警及最重要的是冲突分析能力，并加强我们在国家和联合国一级的应对能力，以便在各级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风险。这要求从秘书长办公室开始，将这些问题保留在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的各种议程上，并要求我们加强和统一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组织之间的协调。

同样，我们必须加强在这些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机构间协调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动员，特别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方面。在此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中，提出了任命一位气候和安全问题特别代表的建议。鉴于证据确凿，这一建议值得考虑。

只有通过协调一致和制度化的行动，我们国际社会才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后果，这反过来也将使我们能够应对任何相关的安全挑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图梅什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哈萨克斯坦代表团感谢安理会主席国多米尼加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赞扬你选择了这个非常及时和关键的问题，并期待在这方面提高认识和采取行动。

我们还对今天的各位通报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先生和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提出的全面见解表示赞赏。

我们承认，地球气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安全问题，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无数直接和间接后果。我们看到人类不安全与暴力冲突之间以及气候变化与缺乏发展之间的直接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是基于地方和社会群体的脆弱性、生计的性质以及各国在发展和建立和平方面的作用和能力，也是基于可获得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同样，海平面上升也危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重点关注其他地方因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缺少饮用水以及日益频繁的飓风、地震、山火和山体滑坡而发生的带来破坏以及最终导致暴力冲突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主动全面了解与气候灾害有关的风险和脆弱性，建立预警系统，制定减少风险、备灾和管理战略。通过会员国之间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多边做法，及时共享信息和开展风险管理，从而加强了这些工作的力度。

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加强协同，以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以及最近在卡托维兹通过的一套强有力的《巴黎协定》实施准则。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今年9月举行的气候峰会辩论能够达成更有效的路线图。

近几十年来，全球环境状况威胁到包括中亚在内的所有区域。哈萨克斯坦受到全球变暖尤其是冰川快速融化的影响，到2050年，本区域的饮用水和灌溉用水的供应极有可能会枯竭。这是秘鲁、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和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这方面，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设立的中亚地区冰川学中心将为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献计献策。

哈萨克斯坦也受到咸海灾害的负面影响，这种灾害严重影响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乌兹别克同事也提到了这一点。在过去四十年里，我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减缓咸海急剧萎缩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积极参与中亚各国在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的授权范围内富于成效的跨境水资源合作。由于这一值得称赞的举措，近年来，我们已将咸海水面面积增加了1000平方公里，使其容量增加了一倍，从15立方千米增加到近30立方千米。我们还恢复了咸海盆地的19个湖泊。不过，国际支助对本区域仍然十分重要。

此外，自2016年以来，我们率先在阿拉木图建立了中亚应急和减灾中心，以降低紧急情况的风险，减轻其后果，并通过区域和国际合作，协调共同应对。该中心计划在中亚发生大规模紧急情况时充当行动基地。必须指出的是，该中心与其他捐助机构和国际组织一道，启动和实施了应急和减灾领域的20多个联合方案和项目，总额达到170万美元。阿富汗已被授予该中心的观察员地位。因此，该中心可成为中亚和阿富汗的区域灾害管理中心。

新的全球化趋势意味着威胁具有跨国和跨界性，需要采取一种新的范式来加以应对。相应地，这就需要从具体的国家战略过渡到区域战略。因此，哈萨克斯坦提议在阿拉木图设立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中心，目的是加强联合国机构、区域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协同，以减缓和管理各种危机，建设复原力，确保可持续发展。

哈萨克斯坦重申，它致力于保护地球上的宝贵资源，它们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遗产和财富。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

Simonyan女士（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亚美尼亚感谢安理会主席多米尼加共和国发起本次公开辩论会。今天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讨论气候变化及相关灾害的广泛负面后果以及它们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气象记录和气候预测充分证明了生态系统和人口的脆弱性，并凸显出需要加强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有效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

由于世界继续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包括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的风险，了解脆弱性、发展有效预警能力、制定协调一致的灾害应对计划和确保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对于减少灾害对人类生命、和平与安全造成的风险将至关重要。承认相互依存、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以及各国真诚的合作承诺是成功减少风险的关键先决条件。

亚美尼亚处于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非常熟悉自然灾害的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去年12月是1988年亚美尼亚北部地区发生破坏性地震30周年。那次地震共造成25000多人死亡，数万人受伤，几十万人无家可归。亚美尼亚仍受到那次灾后果的困扰，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社区遭到破坏，工业陷入瘫痪，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

我们的经验说明了区域和全球合作对应对灾害和减少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促使我国优先考虑增强复原力和加强国家备灾能力。鉴于其山地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亚美尼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迫使其必须优先考虑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在制定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政策时，我们始终以生态系统的做法为指引，遵循绿色经济原则，特别关注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公共生活领域。

去年6月，亚美尼亚主办了中亚和高加索减少灾害风险次区域论坛，汇集了中亚和南高加索各国的代表以及涉足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在《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巴黎协定》通过三年后，与会者回顾了取得的进展，分享了看法，并重申其致力于开展有效的多边合作，以便更好地备灾。我们强调这种合作在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的潜力。亚美尼亚随时准备为区域对话提供平台，推动

交流与合作，以期更好地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姆利纳日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主动举行这次重要的部长级公开辩论会，以进一步强调人类与环境安全之间的联系以及安全理事会如何在气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相关风险方面履行其职能。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在工作中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

斯洛伐克代表团有幸在联合王国代表团首次在2007年开展这一讨论（见S/PV.5663）时，担任安理会当选理事。从那时起，安理会对气候变化相关安全问题的审议有所增加。2017年，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乍得湖流域的第2349(2017)号决议，并在2018年3月通过了关于索马里的第2408(2018)号决议，其中也载有关于气候与安全的语言。这些都是沿正确方向采取的重要步骤。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我谨对其发言补充几点意见。

一般而言，如果冲突风险是真实的，那么它的根源何在并不重要。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也是我们大家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它给我们的健康、营养、经济增长和安全以及子孙后代的生计构成严重风险。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造成世界各地某些人口的脆弱性加剧。它使各国政府和社会穷于应付，并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我们必须采取及时、协调一致和可持续的气候行动，以减轻其消极后果，加强能源安全并保护环境。我们必须加快行动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我们欢迎秘书长努力将气候问题摆在国际议程首位，并在全球一级持续进行政治和外交动员。实际上，联合国应当竭尽所能，牵头促进和协调关于气候行动的全球努力，同时与区域伙伴和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包括企业和地方当局等非国家行为体合作。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一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我国代表团鼓励安全理事会继续想方设法解决气候变化对冲突的影响，并按照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限和授权寻求必要对策。

我们确实需要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采取一种统筹应对措施，以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维持和平和复原能力为重点。必须跨越各机构和部门之间的界线，以便能够以更加统筹兼顾的方式工作，将人道主义、发展、减缓气候变化以及与和平与安全相关的行动连接起来。

2016年5月27日，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内罗毕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承认健康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管理的资源在降低武装冲突威胁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采取步骤，更有效地应对战争和冲突给环境和养护工作构成的重大威胁以及自然资源可能在助长武装冲突方面的作用。

我要阐述的最后一个问题与和平行动中的环境管理有关。众所周知，大规模维和行动和所部署的人数众多，有可能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呼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全面落实联合国于2016年11月启动的《环境战略》。联合国系统各有关部门、包括安全理事会都应当密切合作应对这类潜在风险。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把气候变化视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决定性挑战。秘书长警告我们：

> “气候变化的速度比我们的速度更快，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宜早不宜迟，以免为时太晚。”

多边主义是一个关键工具，能够也应该实施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解决方案。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口号是“共同变革”。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

安全理事会应当为管理和减轻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斯洛伐克全面致力于在我们为此承担的集体责任范围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格雷瓜尔·范·哈伦夫人（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祝贺你当选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并就一个你知道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召开这次辩论会。作为安理会成员，多米尼加共和国有机会代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放大了这个声音。荷兰王国由四个自治国家组成，其中阿鲁巴、库拉索及圣马丁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遗憾的是，圣马丁首相很想来此参加今天的辩论会，但是因有急事，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

荷兰王国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通过今天召开关于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辩论会，多米尼加共和国请各会员国处理一个秘书长视其为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气候变化。因为荷兰王国的一些国家是其近邻，我们欢迎这个重点议题。

加勒比是一个特别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如安理会所知，圣马丁是2017年9月受飓风“厄玛”影响最为严重的岛屿之一。这场有记录以来威力最大的飓风重创了那里70%的房屋，迫使人数空前的民众住进公共避难所。今天，圣马丁人和其他加勒比公民仍面对飓风的后果。

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不可否认的。气候灾害的风险加大，意味着人类安全面临更大威胁，脆弱性加剧。今天各位通报人强调飓风等与气候相关的灾害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并引起环境退化，由此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情况下，请允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三预”办法：如果我们想预防，我们就需要预测和预备。如果我们能预测自然灾害对安全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朝着应对这类风险走近了一步。正因如此，荷兰王国一再呼吁进行一种综合风险评估与分析，还呼吁加强该领域的机构能力。综合风险评估应当涵盖所有威胁倍增因素，包括缺水和气候变化。在我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共同主办的一次关于水、和平与安全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上，世界资源研究所提供了一种促进此类风险评估的预警工具。这类工具可能有助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加强风险评估与分析。

我们欣见安理会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鼓励它将此推广到相关国家局势和派驻特派团的情况。健全的风险评估使我们能够制订联合风险管理战略，换言之，预备。联合国系统和各会员国需要更好地预备，而不只是识别风险，而是要据此加强行动和制订相应方案。为此，关键是授权任务反映综合风险评估的必要性，并使各特派团和联合国实体具备这样做的机构能力和手段。联合国应当在其所有支柱中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以及时解决与气候和水有关的安全风险。

在联合国之外，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以分享知识和最佳做法，并探索可行的对策。为此，在2018年12月13日，荷兰王国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卓越中心及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局一道，召开了一次全球安全问题加勒比会议。其成果将为2月19日和20日在海牙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做出贡献。我们希望看到今天的很多与会者出席这次会议。

最后，如果我们通过预警作出更好的预测，并通过尽早行动做更好的预备，我们就能预防冲突。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最终的预防议程，其中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13。它对安全的影响如同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以及影响人类安全的越来越多与气候有关的灾害一样，也十分重要。圣马丁人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会导致哪些后果。因此，我

们欢迎秘书长今年9月召开气候峰会。这次峰会是处理气候变化所有方面的机会，包括可以处理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以及通过采取适应措施建设具有复原力的社会。

正如秘书长所说，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敦促安理会呼吁进行综合风险评估并鼓励编制对关注气候和冲突的方案，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优先地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伯利兹代表发言。

Young女士（伯利兹）(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同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选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并赞扬你勇敢地决定在安全理事会任期的开始，就一个包含——而且无可辩驳是——当代一个决定性问题的议题展开辩论。

我可以坚定地这样说，因为我代表一组身处气候变化前沿的国家。如果我们岛屿和低洼沿海国家的人民今天能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在维持卑微生计方面每天面临的挑战：盐水入侵，渗入他们的饮用水和灌溉用水；农民在试图适应不断变化的降雨模式时，被迫承担更多的债务；渔民被迫到越来越远之处，以获得哪怕一天的渔获量，因为海洋生物迁移到传统游弋地带以外的地区；面对海平面上升和超级飓风的家庭失去了家园和工作，不幸的是，有时甚至失去亲人。这一现实正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速度被复制，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在其题为“全球升温1.5°C”的特别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先前预测的更为严重，相关的风险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福祉而言大幅增加。因此，我们在争夺稀缺资源的冲突、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领土损失中所看到的是气专委特别报告中提到的各种相关风险。这些是当今世界易受气候影响者的经历，他们对和平与安全已经脆弱的希望正在消失。气专委的调查结果证实，如果不作出大幅度的系统转变，当前人类引发的全球升温轨迹将对我们的星球造成严重而且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影响，并带来不可避免的人道主义后果。

面对这种前景，加上已经对人类和地球造成可怕后果的影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气候相关风险的首要措施是根据科学确定的1.5摄氏度，采取明确而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得到采取适应措施所需的支持，在我们的适应能力已经用尽的情况下，必须确保我们获得弥补损失和损害的援助。我们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及其相关进程，包括《巴黎协定》，是谈判和协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论坛。小岛屿国家联盟强调，迫切需要提高近期目标，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我们还强调，迫切需要弥补持续存在的适应行动资金缺口。同样，我们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机制来处理损失和损害。

我们希望，今天辩论的结果将包括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巴黎协定》目标和1.5°C道路所需的雄心勃勃的行动。会议结果还应包括呼吁我们的发达国家伙伴调集必要的资源，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足够和可预测的额外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

尽管《气候公约》规定了必要的气候行动和支持，但我们还必须承认气候变化具有多层面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气候公约》的范围，因此必须在所有相关框架、机制和联合国机构中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加以应对。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更有必要全面了解气候变化和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带来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风险，以便能够采取适当行动。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已经作出初步努力，在秘书长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纳入气候风险评估，而且努

力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有关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影响的信息和培训。小岛屿国家联盟敦促安理会利用这次辩论凝聚政治意愿，确保这些初步努力实现标准化并得到改进。为此，我们提出三个考虑要素。

一个初步要素是确保安全理事会确定风险的工作以气候变化方面现有的最佳科学为指导，例如气专委评估报告。第二个相关要素是需要提高联合国系统的分析能力，以便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需要和局势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威胁。第三个要素是需要协调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以提高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妇女、青年和土著社区等最弱势群体减轻这些威胁的总体能力。这样，联合国系统、包括安全理事会就能更好地确定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安全威胁，做好准备，发挥互补作用，防止这些威胁升级到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程度。

必须将全面理解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对策包括采取行动，通过更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减缓全球升温，建设抗灾能力，并在短期和长期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联合国系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以协调这方面的行动，确保我们的应对链不会出现缺口或薄弱环节。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超越国家和边界的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习惯体制规范和任务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这是对我们星球的未来和全人类生存的根本威胁。我们希望这次辩论会成为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踏脚石，而且安全理事会决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借此机会向与会者介绍小岛屿国家联盟将于2月19日主办的题为“通过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复原力和扩大发展视野”的会外活动。欢迎所有人参加。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图瓦卢代表发言。

Laloniu先生（图瓦卢）（*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12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言，即基里巴斯、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瓦努阿图和我国图瓦卢。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太平洋区域向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代表太平洋大家庭赞赏召开这次辩论，讨论气候引发的灾害如何影响我们的稳定、和平与安全。

我们赞同伯利兹常驻代表以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还赞同瑙鲁共和国常驻代表以在联合国派驻代表的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气候变化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威胁，造成严重缺水、更持久的干旱、更频繁的洪水以及更严重、更强烈的气旋。所有国家都在遭受更为频繁、更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

人们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复原和重建方面十分清楚，尽管仍远未得到充分处理，但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因素却差得更远。作为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气候引发的灾害的安全影响以及对我们根本生活方式遭受的现有威胁给予应有的承认。这些威胁是我们太平洋各国人民每天面临的现实。

我们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气候引发的灾害日益频繁。仅在上个月，太平洋区域就遭遇了若干热带气旋和低气压，造成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的严重降雨和海水泛滥，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

当像我国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年复一年面临持续的破坏时，我们的经济难以有足够的喘息时间来恢复。气候引发的灾害损害我们的经济稳定，如果不作出紧急、认真的努力，经济不稳定就有可能损害治理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2018年，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太平洋各国领导人重申，气候变化是对太平洋各国人民生计、安全和福祉的最大威胁。我们各国领导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日益复杂的区域安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环境有可能损害国家和区域稳定，并造成极端脆弱性。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论坛上都谈到了更加脆弱性的影响，我们重申这些看法。太平洋现在是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的全球中心。各种国际网络利用此类活动进行洗钱、非法毒品贩运和跨洋非法人口流动。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呼吁安理会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国际安全层面。为此，安全理事会需要跟踪并得到对气候引发的灾害的持续安全影响的明确分析；联合国需要通过一名特别代表集中关注气候安全问题；需要支持预防性干预措施，以保护小国不陷入长期的不稳定周期。

我们要强调需要进行适当的评估和分析。需要评估联合国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的能力。我们需要更多关于气候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潜在危险因素的信息。我们需要评估如何能够改进我们的监测和对策。我们需要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分析和信息，以使安理会更有能力作出更知情的决定。这种信息、评估和分析将使安理会乃至整个系统能够更好地定位，作出有针对性的反应，向脆弱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一直呼吁任命一名气候与安全问题特别代表。这一任命可确保提供适当的分析，并解决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之间的差距和协调问题。我们再次呼吁任命这样一位特别代表，我们寻求安理会所有成员的支持。

展望未来，我们面前的挑战只有通过新的运作模式予以应对。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不要对气候变化构成的非常实际的安全挑战视而不见，要听取我们的呼吁立刻采取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布卡杜姆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主席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你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感谢你发起这次公开辩论，并让我向安理会介绍我们对审议中问题的看法。我还要向今天上午的通报者表示感谢。

首先，安全理事会审议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似乎有些尴尬。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有许多问题，人们对它在预防冲突和解决现有冲突方面的行动和效率寄予厚望。我们可能会认为，安理会理应把重点放在这些问题上，而不是为审议开辟新的、未界定的领域。

第二，我们认为，气候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并不遥远，我们亲眼目睹气候变化在非洲和地中海区域，包括在我国的地理区域，无疑产生了消极和危险影响，这些区域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视为热点。

第三，我要特别指出，尽管我们非洲大陆对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责任最小，但受到荒漠化、土地退化、干旱、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等危险灾害的影响却最大。不仅诸如萨赫勒等区域，而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受到这种不利后果的直接影响。忽视这种情况对那些本已贫穷的人口产生的影响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在古代，人类为食物和住所而争斗，而当水、食物和住所稀缺，并且由于任何原因而无法满足基本需求时，人类将继续为这些东西而争斗。

第四，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贫困和资源匮乏状况为包括恐怖主义集团和犯罪集团在内的所有邪恶团体打开了大门，使它们像在萨赫勒地区那样滋生泛滥。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危险局势将继续迫使受影响的人们背井离乡，开始被迫移民，往往是向北方移动，他们认为那里的资源更丰富，

环境更安全，从而造成我们今天大家都目睹的所有悲剧，例如地中海发生的悲剧。

第五，情况复杂，涉及众多利益攸关方。对安全理事会来说，问题很简单：是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引起冲突，还是冲突阻止我们处理有关地区的环境问题和发展？第六，依我们之见，认为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使命和责任尚有待确定并无不当。事实上，安全理事会2011年便踏上这一征程，就此问题发表了首项主席声明（S/PRST/2011/15），我提醒安理会成员，当时，声明正确地指出了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责任和职权。我不能不重申，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承诺通过《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申，2011年的主席声明提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负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的职责和责任（S/PRST/2011/15，第3段）。我们依然认为，《气候公约》下的《巴黎协定》是通过必须遵守的承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绝佳框架。

第七，我国继续倡导预防和解决冲突，为此解决冲突的根源，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根源还是——对，今天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表明的——环境根源。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涉及多个层面。的确，就界定“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概念而言，我们仍存在分歧，必须以某种方式明确无误地澄清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在此紧要关头的工作——我谨指出，这是我们的内政——必须从预防与合作着手，并且始终铭记，任何人都无法免受无所作为或麻木不仁的影响。

我愿以我所在的非洲大陆的情况举出一个明显的实例。今天上午，与会者正确地提到，乍得湖枯竭与涉及恐怖主义的活动存在关联。显然，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找到了沃土。由于资源匮乏，民众除了被迫移民或落入流氓团体手中之外，别无出路。在此紧要关头，理应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什么具体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依靠区域组织，并与它们开展合作，联手采取行动，拿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是要与非洲联盟一道这样做。现在已制定一些机制。我强烈建议，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应讨论一个气候相关灾害对和平与安全产生什么影响的议程项目。其次，关于预防，非洲联盟等机制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维和行动等次区域实体完全能够达到以下目的：至少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它们认为气候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三，我们必须依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新的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地协调员的工作，包括分析工作。

最后，我呼吁进行一次明确的评估，确定如何推进这一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发言。

努塞贝女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同其他人一道祝贺多米尼加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和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重要事项。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之长，证明这一问题对许多会员国都很重要。如其他人所言，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我要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先生召开今天的重要讨论会，并感谢今天上午的通报者所作的通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致力于气候行动，我们热切期待秘书长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气候峰会。我们赞扬他为遏制气候变化发挥的领导作用和所做的不懈努力。因此，正如秘书长昨天宣布的那样，我们对6月份在阿布扎比主办首脑会议筹备会议感到自豪。

气候变化早已不再只是环境工作者关切的问题。随着联合国会员国面临极端气温、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及受气候影响的移民现象，应对气候变化——或者用专家的话来说是“适应气候变化”——现在已成为生活中的严酷现实。更有甚

者，这种适应往往成为人道主义救济和规划的代名词。

如许多人今天在此所言，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安全问题，而且在安理会讨论的其它事项对我们而言同样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今后会加大现有的安全关切，并有可能产生新的关切。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军事专家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不断变化的气候对一些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流离失所和毁灭威胁。此外，粮食和水没有保障、失去住所、生计恶化以及在一再发生的灾害后产生的无能为力感，为绝望情绪、极端主义因而也为不稳定铺设了温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这些紧迫的气候相关挑战产生的影响深感关切，无论在我们自己的边界内，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的安全，同时也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能够一道共同解决的问题。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气候变化对许多小岛屿国家的基本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其中一些国家就可能持续遭到破坏，甚或被水淹没，从而引发人口流动，在领土控制和完整方面带来新的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联不一定需要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机制，但是，我们应该开展更多的工作，重新规划气候行动。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和资助受旱地区的生计虽然素来被视为发展或人道主义事务，但实际上是对安保的投入，应该形成这样的认识。

总体而言，会员国、捐助方及联合国系统必须通过气候行动有的放矢，解决安全无保障的问题。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可以是承诺在安全最有可能因气候原因而无保障抑或已经无保障的地方扩大发展工作。例如，许多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尤以年轻人为甚。提供生计、教育或培训的有针对性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能够减轻与气候相关的失业助长安全无保障的风险。

同样，会员国、捐助方及联合国系统可以结合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现有努力，以及在易受气候影响的社区建设抗灾基础设施的新努力。例如，利用太阳能为保健中心、学校及企业供电，可以同时减缓气候变化和助长安全无保障的因素。

捐助国和国际发展机构也可根据预测可能发生气候灾害之地的科学模型分配资金。根据预测提供经费的做法能够增强高危社区的抵御力，并遏制引发不安全和人口迁移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6月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气候峰会筹备会议上说明的切实方案和可能承诺。我们殷切期待在那里欢迎各会员国。

今天的会议证明，气候变化与安全无保障之间的关联真切存在，国际社会也认识到确实如此。这要求在安理厅采取具体行动并予以关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毛里求斯代表发言。

索马鲁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我赞扬多米尼加共和国倡议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重点讨论气候相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对概念说明（S/2019/1，附件）表示特别赞赏，其中载有指导我们今天讨论会的切当问题。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个兄弟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主持本次重要会议。

毛里求斯赞同伯利兹代表洛伊丝·杨大使以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也衷心感谢与会者今天上午富有启发性的证言和通报。

将气候变化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是一项重大挑战，但是，作出需要会员国作出积极决定的决策是一项愈加重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很高兴有此机会真诚地表示希望，主席的总结将促成会员国最终会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它们特殊的脆弱性，因此气候变化是一个生存挑战。然而，没有哪个国家能避开气候变化的危险。大国和小国广泛参加今天的会议，证明了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是

每个人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环境或发展问题，也是对我们地球和平、稳定和可持续性的复杂威胁，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助长政治暴力，削弱政府的能力。与气候有关的迁移和流离失所会造成冲突，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种可能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只有通过加强合作、全球领导和共担责任，才能妥善应对这种威胁。因此，安全理事会是应对这个全球安全与繁荣威胁的适当平台。

我们都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历史性突破。然而，我们今天必须承认，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足。地球各处的气候事件正在恶化并酿成灾难。空前的全球变暖时代正在来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证实，全球只要变暖1.5摄氏度，与气候相关的健康、生计、粮食保障、供水、人类安全和经济增长风险预计就会恶化。

对我国来说，所有与气候有关的指标都显示出恶化的迹象。气温和海平面上升，年降雨和降水量下降，海滩——我们的主要经济支柱——受到侵蚀，用水压力前景堪忧，我们的农业生产也可能下降，这都可能危及我们的生计和稳定。

我们无比赞同秘书长所说的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人类正在输掉与气候变化的比赛。现在，我们是时候不光喊口号了。对我们来说，安全理事会仍是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办法的一部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所有人，特别是各位通报人。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论坛，也是一次成功的辩论会，有82位代表发言，各抒已见。一些国家依然不明白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感受。我们害怕我们会消失，或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让我们的经济倒退10年或15年。我希望我们将继续大声疾呼，直到人们听到这些声音。

下午6时15分散会。